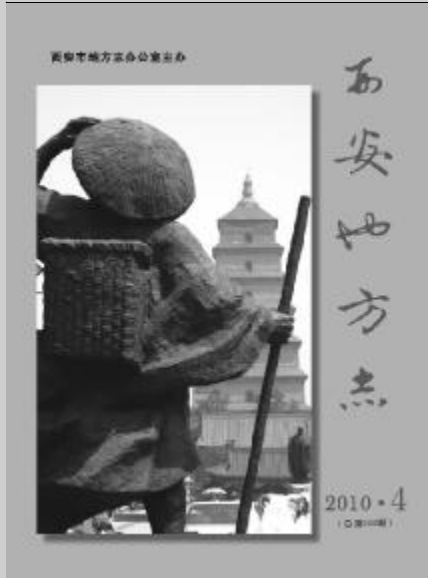


目 录



西安地方志

2010·第4期

(总第205期)

陕新出内印字 0057 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历代名人与西安

- 汤若望到西安传教 (3)
李自成西安建大顺 (4)

学术交流

- 第二轮修志的创新与继承问题 彭栋为(5)
从读志用志的角度看如何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
..... 刘秋增 王耀生(9)

人物春秋

- 高仰山 (14)
惠子俊 (15)

史料钩沉

- 关于韩信墓与火烧村的传说 吕忠让(16)
“无为而治”：“去甚、去奢、去泰” (18)
至善巷里的特拘所 封五昌(20)
古代的房地产 (22)

西安风情

- 西安古城墙之城墙典故(三) (25)
雁塔区古城堡遗址 (27)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

- 长安区楮皮纸制作技艺 富小云(28)

文史拾趣

- 金榜题名与“吃梦” (24)
钱氏家训的力量 (29)
包青天为何鲜有朋友 (30)
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 (31)
武则天并未造“曷”字 (32)
古代尊师的皇帝 (33)

《西安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冯艳阳

副主任:姚敏杰 任昆明

委员:王莹 张耀 崔义萍

杨军亚 彭栋为

《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主编:姚敏杰

副主编:张耀

责任编辑:王文竹 宋亚颖

主办: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辑:《西安地方志》编辑部

地址:西安市二府街 27 号

邮编:710003

西安地情网:www.xadqw.cn

西安市地情资料信息中心基础数据库

Ve.xdwy.com.cn/difangzhi

E-mail:zhangyao55@sohu.com

电话:029-87296801

“拜倒在石榴裙下”从何而来	(34)
蜗居何以成“贫穷”代名词	(35)
清代八旗兵的特权	(37)
戈登的愤怒	(40)
铁丝网改变世界面貌	(42)
清朝选官以貌取人	(43)

志鉴动态

西安市区县志办主任会议暨文化部类志稿 研讨会召开	(44)
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文化部类志稿研讨会 会议纪要	(46)

知识窗

离别之歌为何称“骊歌”	(31)
“鸿沟”的来历	(39)
雨衣起源于周代	(41)
古代交通工具	(45)
“三寸之舌”缘何不烂	(49)
中国版世界地图是怎样产生的	(50)
“挂靴”与“挂冠”	(51)
古人如何防暑降温	(52)
古人如何将瓷器运往欧洲	(53)
“割股疗亲”割的是哪里	(53)
“弹指”有多快	(54)
“八百里加急”有多急	(54)
唐代的“疾足”	(55)
手杖与年龄	(55)

历代诗人咏长安

过华清宫	李贺(56)
------------	--------

解字

“上”	(14)
“下”	(21)

名句欣赏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等 5 句	(48)
------------------------	------



汤若望 到西安传教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崇圣寺院内出土了一块珍贵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它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碑文中载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教旨、仪式及在中国流传的情况,碑侧有叙利亚文题记,是研究欧亚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宝贵资料。这一消息惊动了在北京的外国人汤若望,他以考察该碑和传播天主教为名,来到了西安。

汤若望(1591~1666年),原名亚当·沙尔,德国人,天主教耶稣会著名传教士。天启二年(1622年)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来中国,初在北京学习汉语,天启七年(1627年)到西安传教。在他来西安的前一二年,已有西方传教士金尼阁、阳马诺、鲁德照三人到过西安。他们在陕西泾阳人王徵的帮助下,在西安糖坊街建立了天主教堂。当时,西安只有少数知

识分子从学术研究的需要出发,信奉天主教,广大民众对之根本不感兴趣,而且极表反对。《汤若望传》记述,金尼阁和鲁德照在西安“感到特别的苦恼,鲁德照口里竟常说,他觉得南京的牢狱比西安还好受呢”。

汤若望在西安除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传播了天主教外,还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研究“自从利马窦神甫时代以来,中国传教会就从事研究的由欧洲赴中国一条陆路的问题”。他在西安不仅对这个问题十分注意,而且还确定了西安在地理图上的纬度,并向德国政府作了详细的报告。

汤若望到西安传教,给古都西安带来了新鲜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空气。此后,欧洲人到西安日渐增多,设教堂,立学校,进行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



李自成 西安建大顺

明代末年,由于土地兼并,政治黑暗,加上长期旱灾,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因而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农民革命战争。

李自成(1606~1645年),本名鸿基,陕北米脂人。出身农民,幼为牧童,后充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发动兵变,参加高迎祥、王嘉胤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八年(1635年)荥阳(今河南荥阳)大会后,随高迎祥入陕西。八月攻克咸阳,后入河南。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与陕西巡抚都御史孙传庭战于周至,兵败牺牲。李自成继为闯王,成为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潼关原之战,起义

军遭受严重挫折,李自成与蓝田县铁匠出身的将领刘宗敏以18骑突围,进入商洛山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攻占湖北襄阳,次年初建立农民政权,称新顺王。十月,从事顾君恩向其建议:“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攻退守,万全无失。”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意见,西攻潼关,连陷华阴、渭南,初十日攻下临潼,十一日进逼西安。西安守将王根子射书城下,开东门投降,李自成率军进入西安。旋即改西安为长安,称为西京。发动群众修城垣,开驰道,在鼓楼西北置南、北教场,“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庚寅日,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建号大顺,改元永昌,仿照唐朝制度,组织了中央政府。并铸永昌钱,造《甲申历》,定军制。其时,大顺政权共有步兵40万,骑兵60万,兵政侍郎杨卫休为都肆,出横门,至渭桥,“环转不绝,金鼓动地”。西安城经过修整,“视前制倍加壮丽”。

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由西安出发,渡黄河,向北京,一举消灭明王朝。李自成于四月称帝于北京。不久由于骄傲和腐化,加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于七月退回西安。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清兵追袭至关中,李自成弃西安,经蓝田、商州入湖北。闰六月,李自成在通山县九宫山遇难,年仅39岁。



创新与继承问题的 第二轮修志的

◎

彭栋为

首届修志以迄于今，方志界关于新形势下志书篇目结构与记述内容之创新的探讨话题可谓不知凡几，多不胜数。但从第二轮志书编纂的多数尝试及其实际效果来看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其个别者，不仅不能求得业内人士的基本认同，甚至自乱体例，于无意中造成了对方志主流观点乃至传统体例的背离与颠覆。

之所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情形，究其症结，推其根源，主要在于我们的一些修志者其自身的专业根柢还不牢固，知识积淀尚欠丰厚，便满以为自己对方志编纂的精髓要义已经驾轻就熟、了然于胸，从而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以求在这一领域一展身手，独辟蹊径，开创出一片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天地来。

诚然，这种敢想敢干、不盲目迷信于权威的革故鼎新的精神是值得褒扬，也值得奖掖鼓励的。但作为一种立足实际的科学的态度，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毕竟是不可取的。

方志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有国粹和一门独特学科，她经历了无数方家、学人上下千余年筚路蓝缕、呕心沥血般的倾心浇灌、百般呵护和千锤百炼，以至形成现在可见而堪称完备学科体系之架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来之不易，她凝结、倾注了无数俊彦、先贤的心智和血汗，乃历代修志人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因而，作为此项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程中的一员，我们除了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先在跌爬摇晃中牙牙学语，于循序渐进中由浅入深，日积月累，做一个踏实勤奋、潜心向学的好学生，实在不当以半瓶之醋当、井口之片天，便以为天下之学皆在于己，匆忙间挺丈八蛇矛，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势，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置古今枭雄于胯下，视世间豪杰如儿郎。如此这般，贻笑大方，最终蒙羞取辱的只能是他自己，绝无他途可觅。

如此说，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蓄意要

给那些锐意创新者以当头棒喝,泼一瓢冷水,给一点颜色。只是提示时下同仁,“创新”一词,听起来悦耳,看起来很美,然而要想真正将它付诸实践,变为现实,却无论如何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所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笔者之意,无非示以业内同仁:创新方志,固然堪褒可嘉,但也宜当深思熟虑,妥善处理好以下几重关系:

第一,革故鼎新与承继历代方志优良传统的关系。

方志的创新与继承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如同刀剑的两个锋面,没有这一面便没有另一面,若无继承借鉴则绝无创新发展可言。因此,欲求创新发展,须先俯下身,从无到有自启蒙做起。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阅读一些方志基础理论书籍和古今志书,做一些方志理论的探讨研究与志书编纂实践的尝试摸索。在全面了解方志事以类聚、类为一志、横排门类、纵写史实、横不可缺项、纵不能断线等早已定型之体例格局的基础上,于继承、汲取中再去探究前人贡献中的局限与不足,扬其长而避其短,使数千年的方志优良传统和主流思想得以正常传承,并且能在我们的手里得到发展和完善。但不管怎么说,创新只能是继承中的创新,发展也只能是遵从方志固有定例、发扬方志优良传统前提下的发展。否则,方志的创新发展便犹如空中楼阁,无从谈起。举凡方志发展史上卓有建树的巨擘、大家,其无一不是在前人研究、创造基础上的继承和超越。有明一代著名方志理论家康海提出的“详今略古”是基于前人

“统合古今”的理论升华与完善,而作为清代方志地理学派代表人物之戴震关于人物记载“生不立传”的观点又是依循康海人物立传主张的再发展。即便是方志学奠基人及集大成者的章学诚,他的诸多里程碑式的如被后人誉为“志书的大法”的“三书”(志、掌故、文征)、“四体”(外纪、年谱、考、传)等创见,仍然是继承基础上的新跨越,与前人“事以类分,类为一志,横分门类,纵贯时间”之基本原则有一脉相承之联系。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继承发扬旧志优良传统之对于创新发展新编方志体例内容的不可或缺。知今须鉴古,无古不成今。但愿我们的一些修志同仁,不要数典忘祖,踩着古人的肩膀来糟践古人,标榜自己。

第二,创新要考虑所创内容与左邻右舍的关系。

一部质量上乘、鲜有瑕疵的志书必是匠心独具、多个方面均经得起推敲的有机整体;与之相反,一部为人诟病的志书,则一定是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的古今杂糅。虽然,主观上谁也不希望事情会有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但画虎不成反类犬,羊质虎皮终是羊,客观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的残酷和无情。比如于今一些志书好赶时髦,喜欢以“产业”命名,明明是一级区县志书,便不管不顾地要将原有的“邮政电信”和“旅游”等拔高为“信息产业”、“旅游产业”与“某某产业”。且不说信息产业界限宽广,它既包涵计算机产业和软件业,又容括通信业及信息服务业,一个区县的邮政电信根本就担当不起信息产业之名实。即使名副其实,以“产业”命名,亦是有欠思量的。因为邮电、旅游即便可称产业,也属于第三产业。

与它同处于这个范畴的“同侪”们,尚有商业、餐饮、修理、金融、保险、客运货运、文化教育、法律事务、科研、咨询等事业,那么这些同辈的“哥们”是否也应“利益均沾”,享受同一级别的待遇而冠以“产业”之名称呢?事情还不仅仅就此终结,既然第三产业可以这么做,那么第二产业的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一产业的大农业,不是都可以顺理成章地一律易装换帽,谓之“产业”之篇名吗?故以产业命名不管名曰创新也罢,还是叫它彰显时代特征也罢,都是失之偏颇,大不可取的。究其成因就在于它藏头露尾,顾此失彼,搞得左邻右舍皆不得安生。

还见一部县志将多个分志名称缀以“资源与管理”,如“土地资源与管理”、“人口资源与管理”、“森林资源与管理”等。笔者估摸不透其编纂者为什么非要提名叫响地加上“资源与管理”不可,难道不予白纸黑字上突出它,人们就不认为它还属于“资源”,它的记述还涉及了“管理”内容吗?同样一理,以“资源”、“管理”命名也带来邻里关系上的一个麻烦。你说人口、土地和森林是资源这没错,除了人口既是资源也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累赘以外,土地与森林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资源。但你不要忘了,阳光、空气、动植物、石油、煤炭、天然气以及水与各种矿产等等,它们皆无一例外、不可争议地属于自然资源。那对它们是不是都一定要加上一个“资源”的字眼才不致产生歧义呢?“管理”亦然,试问我们哪部志书所载述的几十个行业与事类不体现其“管理”内容,难道只有画蛇添足地缀上这么一个词语才算冠名准确吗?与其如此,倒不

如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到直接以人口、土地、林业称谓的好,大可不必叠床架屋、劳神费力还难免惹得鸡飞狗跳,人皆不宁。

第三, 注意篇目升格与方志传统体例的关系。

新编社会主义方志自20世纪80年代纂修以来,不少志书为了突出其区域特点和个性风采,打破了方志千百余年形成的“事以类分,类为一志”的基本定例,将其地域特有的事物着意“升格”至篇目的最高层次,使之得以最大限度地凸出和彰显。这种突破事物固有秩序而“另立门户”的做法,虽然客观上较大地改变了地方志书陈陈相因、千志一面的趋同现象,为方志体例与内容的创新吹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但其负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父子比肩”、“祖孙并列”等“僭越”、“乱辈”情况,便是这种探索的次生灾害。对于这种“创新”中的“颠覆”,方志界至今无法两全其美地解决。这也警示我们:纸上谈兵易,事情做起来难!尽管路是人走出来的,但新编方志要走的创新之路,尚“漫漫其修远”,需要我们“上下而求索”。对于采用篇目“升格”以彰显地域特色的尝试,我们无须杯弓蛇影,因噎废食,然而在找出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良方之前,须慎之再慎,切勿操之过急并忌滥用。有些非特色的事物若有意无意间还要“霸王硬上弓”,予以滥升格,则大不足取!如有部县志便将非其县域特色的本当属于商业的服务业,应在工业门类的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从属于公安之治安下面的刑事侦查,提到与商业、工业、治安并列的地位,就显然造成了不当出现的越级并列与层次混乱。

除了以上几种关系需要着重考虑、平衡以外,方志的创新与发展还须防止一种无知无畏、随心所欲的“乱创新”,警惕另一种包藏私心、别有用意的“伪创新”。乱创新的弊病自古即有,于今尤烈。其种种表现如叠床架屋,随意分类;鸡兔同笼,乱点鸳鸯;喧宾夺主,偏离主题;附会穿凿,阐释议论;生造词语,猎奇求异;以表代文、以静态的数字罗列堆砌替代事物动态的兴衰演进历程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已经到了不可小觑,非勒马、刹车不可的地步了。

如果说乱创新者还只是由于学识未丰、积淀尚浅又心浮气躁、急于求成而好心办砸了事的话,那么伪创新者则无论怎么说都是难辞其狗苟蝇营、监守自盗之咎的。首届修志,曾有这么一部县志,将其个人的“小传”堂而皇之的置于书册勒口(书舌),给予自己的名字以多重职分、名号并载于书页显要位置,甚至连其率意而为之涂鸦速写也视为弥足珍品,咋看咋好,难割难舍,索性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地遍插于志书各个空间与旮旯拐角,从而赚得个钵满瓢溢,名利双赢!你尚未置一辞,他倒先入为主曰:此创新也!使你三缄其口,啼笑皆非。无独有偶,有的人也是在娓娓动听的所谓创新的金字招牌下,将志书的彩页图照当成了牟钱敛财的商业广告;有些人则借机把自己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不失时机地塞进志书艺文附录,犹如佛头着粪,给圣洁、严肃的方志蒙上了腌臢污秽、难以洗刷的污点。这种情况长此以往,任由发展,将使国粹方志演义成姜太公乘骑的四不像,谬种流传,贻患无穷!

方志的创新发展,是一项非常繁难、复杂而难能一蹴而就的事,非有非凡之造诣、超卓之见识和丰富、扎实之修志实践经验而莫能为。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要想在此领域中有所突破,须先从无到有,长期沉潜于书山学海,对古人的治学精神及其探究成果肃然而生发一种敬畏感,顶礼膜拜,承袭衣钵。继而登堂入室,由浅入深,在谙熟方志传统体例、具备丰富修志经验并奠定坚实学业基础的前提下再迈出更大更远的步伐,以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次,创新是一种高难度、大智慧的创造,它既不为哗众取宠,也不是标新立异,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轻率。莫把创新视为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对于尚无前例的探索、尝试,须持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谨慎,周思详虑,极尽筹谋,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对于创新的内容要不囿于一己之见地,须是业内人士广泛认同或基本上能够接受的东西。像民国年间的黄炎培便因为广泛涉猎了历代旧志,归其得失,以为“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乏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的不足,从而在其纂修的《川沙县志》卷首及各分卷首设“概述”并新增“大事年表”,就得到了其后迄今方志界的一致认同和仿效。但愿我们的一些锐意革新者,能够像黄炎培老那样真正闯出一条新路来。我们的各级修志机构,亦应针对以往的覆车之鉴,亡羊补牢,尽快制定出相应的防范与制约措施来,以便防患未然,扼杀其“恶之花”于萌芽状态,以壮士断臂之果决,毅然摘除其癌变毒瘤,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能够始终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有序运行,健康发展。

从读志用志的角度看 如何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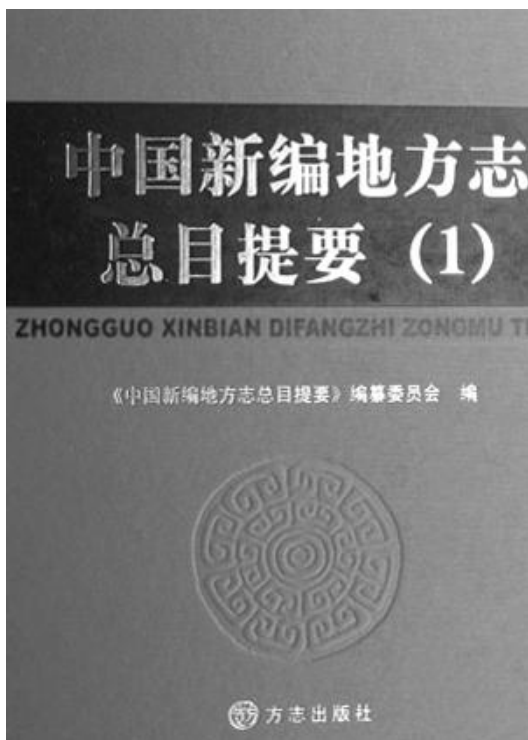
◎ 刘秋增 王耀生

修志与用志是地方志工作中的两个方面,两者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修志与用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具有统一性,集中表现为用寓修中、修志为用、修用相通、修用相长,修与用是一体化的过程。但长期以来,方志界存在一种认识误区,即在思想上重视两者区别,却忽视了两者的统一性;在工作实践上就表现为重修轻用。实际上,读志用志不仅是对志书质量和价值的最终评判,而且对提高志书质量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读志用志要求志书编纂进行创新,要求提高志书

资料、创新体例和加强共性内容记述等方面的质量。长期修志实践表明,读志用志是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外在动力。不仅如此,两者关系还反映出读志用志的一些规律性要求。

一、从读志用志的角度看志书质量存在的通病

笔者曾就读志用志情况做过一些调查,按照读志用志者职业和读志用志意向,可基本分为决策者(党政官员、企事业管理层)、研究者和普通读者三类。这三类被访者对志书质量存在问题的看法是共同的,即志书有用但不够用。决策者认为,志书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地情资料,是了解地情的基本工具书,但志书资料大多为各行业、各部门基础性、浅表性的资料,缺乏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资料,使用价值较高的资料也不是太多;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应不够深刻,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有缺失,仅凭一部志书还难以作出科学的决策。研究者认为,能从志书中查到很多对学术研究有价值的资料,但资料存在不够系统精细,有些关键性资料缺失,资料的原始性也不够,大多数资料没有注释,有些特别珍贵的史料没有注明出处,凡例和编纂始末对此又没有详加说明,让研究者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也不踏实。另外,志书资料没有经过基本的技术处理,查找资料费时费



力。普通读者则认为,志书是“官书”,志书所记大部分内容与其实际生活联系不够密切,所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是人文部分内容)记得又不够详细深入。总之,志书有用但不够用,真实地反映了目前志书的社会价值和志书质量存在的通病。这从另一方面也为当下第二轮志书编纂质量的提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上升的空间。

二、提高第二轮志书质量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用志要求提高志书资料的质量志书本身就是资料性著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志书质量的核心主要表现为资料的价值。志书的有用性就在于它的资料性,修志与用志具有统一性也在于志书的资料性。读志用志的实质也是读资料用资料。所以,读志用志对志书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一,入志资料要真实准确,要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具有相对精细的特征。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历史问题搞得不很清楚,形成许多疑问和争议,需要核查志书资料来解决。比如山东省烟台市史志办公室多次收到东北三省有关部门为30多名烟台籍老干部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胶东地区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有关情况的函件。原来东北一些地区规定,老干部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的退休时可计算工龄,但有些老同志当年在家乡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具体时间自己也说不清楚,历史档案记载又不全。首轮编修的《烟台市志》军事编民兵章中对此有明确记载:“1942年2月,自卫团人员年龄调为满16至50岁。其中16至23岁的男子均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根据这条从市志中查到的资料,当地有关部门认定了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核对了工龄,落实了有关待遇。这一用志事例说明,

用志要求入志资料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要认真,即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历史事实,真实可靠;二是要准确,即要精确严密,不模棱两可。实际上,高质量的志书资料还可纠正一些权威性结论。如关于近代山东烟台茂兰福面粉公司成立时间,《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中国年鉴》等七八部权威著作均认定为民国5年(1916年),但编修首轮《山东省志·粮食志》时,修志人员经过多方考证,认定公司成立时间应为1911年,纠正了原来学术界的权威说法。要做到上述要求,修志人员必须对入志资料进行严格核实、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加以认真考证,确保入志资料的质量。

第二,入志资料要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还要具有原始性和地域性特点。这就要求志书资料要系统。只有系统的资料,才能表现一地自然和经济社会等各种事物、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完整地呈现事物发展全过程,为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提供充分的资料基础。比如志书中只记一份孤立的、一时一地的粮价资料时,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多大使用价值。当志书所记粮价资料较多又较为系统时,能将其综合起来相互对照,就可反映出粮价水平和发展变化趋势,就能做出粮价是稳、是涨、还是跌的正确判断。要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鉴别和筛选,编写资料长编,不仅是提高志书资料质量的有效方法,同时,资料长编本身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存史价值。因为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受篇幅和体例等方面的限制,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并未完全入志。首轮修志中,收集资料入志者一般仅占十分之一或数十分之一。所以,用志中的“志”应当是个大概念,不仅专指志书,还包括各种资料长编、专题资料汇编等。另外,修志过程中要注意搜集挖掘第一手资料,

特别是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第一手资料；同其他部门、行业所拥有的资料及其他地方文献相比,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这才是方志资料的真正优势。还要注意搜集整理体现当地地方特色的资料,如自然特色、经济特色和文化特色等。

第三,要增强志书资料的使用价值,做到用资料说话。一部志书没有多少有分量、有价值的资料,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发挥就没有载体,难以引起读者对志书的关注和读志的兴趣,用志就无从谈起。人口是志书中最平常不过的内容,大部分志书人口部分资料都过于简单,信息含量不足,使用价值不高。当然也有例外,山东省首轮《荣成市志》人口部分资料使用价值较高。该志在人口构成中增加体质构成,并重点记述当地残疾人口状况,并对残疾人情况进行分类,说明肢体残疾、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各有多少人以及所占比重。这就为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注,推进社会福利事业和优生优育提供了准确信息,为党委、政府的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第二轮志书记述流动人口时,一般只记述不同时期流动人口总量,有的延伸到分别记述流入人口、流出人口的数量。但实际上按照提高资料资治价值的要求,这部分资料还可以再进一步延伸细化。如对于流入人口,进一步细分为人的性别、籍贯、年龄和行业分布;流出人口进一步细分为年龄、性别、流出乡镇分布、流向何地、从事何种行业等。这种细化的资料实际上是在提醒当地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关注当地外来人员管理、外来人员子女上学,以及进一步发展哪些优势产业。同时,针对流出人口问题要关注当地婚育、交通设施建设、外出务工人员维权、根据外出人员从事行业调整当地产业结构等一

系列问题,并及时制定有关政策。

第四,用志要求志书编制索引和增加注释。一般志书篇幅都在百万字左右,收录资料较多。读者用志查找资料时,往往费时费力,极为不便。另外,志书本身就是资料性工具书,也应当编制索引。使用索引比阅读目录好处在于:索引提供资料的信息量大,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帮助读者发现所未想到的某些有用的资料,增加志书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索引指明资料的确切位置,提高查阅效率。首轮志书几乎都没有编制索引,这是因对读志用志考虑不足所致。山东省第二轮修志之初就考虑到用志,相当多的志书都编制有索引。如《高青县志》、《周村区志》、《宁阳县志》、《昌乐县志》等。另外,有一点尚未引起方志界足够重视的是志书应当增加资料的注释,注明资料的出处。注释对于用志者使用资料有很大的帮助:1.可补正文资料,增加资料的容量。2.解释正文中资料,包括一些专有名词、方言等,方便用志者理解使用有关资料。3.读志用志调查数据表明,利用方志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在用志者中占了一半以上。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引用资料要注明来源,这就要求志书应该注明资料的出处。比如,利用方志研究古代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时,因为当时原始档案早已不复存在,正史和其他资料又极为缺乏,所以,方志就成为第一手资料。因为它保存了当时当地的资料。当研究地方近现代史时,特别是研究地方现状,首轮和第二轮编修的方志又成为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但这时编修志书的原始档案还存在,只是用志者没有条件看到,所以方志应算作第二手资料。这就要求第二轮志书的一些重要资料,特别是数据资料应该注明出处,增加资料的可信度。利用方志进行学术研究的实践表

明,首轮志书中越是那些珍贵的资料,往往都没有注明出处,让用志者不能放心引用,因为越是珍贵的资料越容易担心其真伪。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读志用志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志书中越是较为重要的资料,就越应该标明出处,目的是在告诉读者大胆使用此条资料。不仅如此,读者还可按图索骥,按照这条资料注释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查找与之相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这就大大方便了用志者的研究工作。志书在学术界的地位会提高,其发挥的作用和价值也会增加。

(二)用志要求方志体例要创新

方志体例既要适应内容的要求,也要有利于读志用志。用志要求方志体例不断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志书结构体式要有新变化。当前志书体式主要有两种,即章节体和条目体,两种体式各有优劣。章节体层级清楚,领属严密,结构严谨,系统状态比较清晰;但缺点是资料易分割,也不便于检索。条目体的长处是资料集中,不易分割,信息含量高,便于归纳和信息化处理,便于编制索引和查找;但不足是内容层级不清,结构松散,内在联系不紧密。有鉴于章节体的缺陷,山东省第二轮修志,青岛市志拟采用条目体,淄博市志拟采用纲目体。志书是经世致用之书,修志本为用志。所以,综合考虑修志与用志两方面的因素,在第二轮修志结构体式的问题上,最科学的办法是融合章节体与条目体各自的长处,形成章节与条目结合的篇章节目体。这种创新体式的长处在于,既可以保持章节体分类合理、层级清楚、逻辑严密的优点,又可以发挥条目体信息含量高、编排灵活、易于编写的长处,让篇章管逻辑,条目管内容。

第二,用志要求重视附录等体裁的作用。

长期以来,附录这种体裁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根本原因,是修志者对用志考虑不够。实际上,构成附录的这部分资料主要有文献辑存、政府公报、地方法规、重要调研报告等。引用志书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往往非常重视资料的原始性。由于附录内容是原文照录,因此,其原始性较强,使用价值并不低。当前,第二轮修志应重视附录的作用,把它看作是完全独立、具有独特功能的体裁,而不是将其看作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志文的附庸。

(三)用志要求志书加强共性内容的记述

读志用志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表明,在三类读志用志者中,决策者和研究者读志用志多是功利型的,普通读者读志用志多是知识普及、浏览休闲阅读,属于非功利型。这部分读者大多是受过一定专业教育的成年人,即每位读者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和职业背景。这样,按照阅读相关性规律,读者阅读志书时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相对熟悉的专业知识内容与志书中的相应内容对接。如有社会学背景的读者对志书中社会部分较感兴趣,有地理专业背景的则对自然环境更感兴趣。志书中有一部分内容则是所有读者都感兴趣的,那就是人文内容。因为人文知识是大家共有的,但在首轮修志中,人文内容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轮志书若加强这方面内容的记述,保存与当地群众情感息息相关的地方历史记忆,就能激起各阶层读者的地域共同体意识和对当地区域文化的认同与参与,满足读志者的精神需求。

当然,除了以上几点外,用志还要求志书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观点,志书文风要严谨朴实,力戒官话、大话等。

三、读志用志的规律

根据上述对修志与用志统一性的分析,

可引申出几条读志用志的规律。

第一，读志用志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实现志书资料的社会化共享。读志用志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修志与用志之间存在着资料供与求的关系。首轮修志和长期读志用志实践表明，在很大意义上，供给决定需求。所以，第二轮修志者在修志之初就应有供求意识，为读志用志考虑，实现从修志者到用志者的角色转换。修志者首先应换位到决策者的角度考虑如何修志。这就要求修志者在收集整理资料时，要从全局出发，从大处着眼，要以改革开放为主线，注重记述当地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经验教训，反映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为党委、政府制定方针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参考。其次要换位到研究者角度修志。这就要求修志者要别具慧眼，有意识去收集、整理、保存尽可能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再次要换位到普通群众的角度，这就要求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考虑普通群众最为关切、最想知道的事物和内容，加强志书中人文内容的记述，从内容上拉近志书与大众的距离。

第二，要切实提高志书编修质量，解决志书有用但不够用的问题。要以用志为导向，对志书的资料、体例、记述内容等方面不断优化创新，提高志书质量。读志用志实践经验表明，志书的质量越高，越有利于读志用志；反之，则相反。

第三，要尽可能提高志书的使用几率。不同知识结构和职业背景的读志用志者对志书中与自己相关度较高的内容感兴趣，这一部分的资料使用几率较高；此外，志书中人文内容则是所有读志用志者都共同感兴趣的内容。所以，第二轮志书应重点加强人文内容的记述，特别是有关婚姻家庭、民风民俗、人民

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突出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吸引更多的读者，以提高志书的使用几率。

第四，读志用志的热点和重点与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相关。比如，近一二年来，我国有些地区爆发了人畜疫病，出现南方冻雨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给国家和社会都造成了较大损失和影响，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学术界也及时利用地方志记载的历史上疫病、地震资料进行相关专题研究，为应对灾疫和减灾防灾提供历史借鉴和决策参考。仅《中国地方志》就在2007、2008连续两年刊发五篇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形成读志用志的热点。

第五，读志用志者个人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也对读志用志开展的深度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较高、研究能力较强的用志者能充分延伸资料的价值，开拓资料使用范围，多角度地挖掘资料的价值，充分发挥志书的作用。相当多的读者则是一般化的利用志书中的资料。现以对志书中极为普通的“八蜡庙”资料使用为例。“八蜡庙”原为历史上祭祀农作物害虫的综合神庙，后演变为专门祭祀蝗虫的庙。志书中“八蜡庙”的资料一般都归类到宗教信仰部分中，用志者也是把它们当作宗教信仰资料使用。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汉祥则在资料使用上独辟蹊径，他查阅3000多种府州县志，逐一从中查找是否有“八蜡庙”的记录。如有，则可断定该地历史上曾有蝗虫灾害发生，从而找出历史上蝗灾分布的范围，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绘出了中国历史上蝗虫灾害分布图。这使本来具有民间宗教信仰价值的“八蜡庙”资料也挖掘出历史地理学的价值。



高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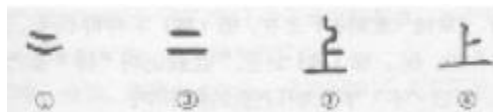
高仰山(1910~1967),陕西米脂人。先后就读于横山高小、榆林中学。193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延长县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会会长、保卫局局长,同年12月调中共中央保卫局任东方特委保卫局局长。抗日战争

期间任陕甘宁边区延属保安处处长,曾先后破获延川“黑军”、宜川“复仇营”、洛川“特工队”、甘泉“邮电所”、延安“谍报组”等多起重大特务案。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东府工委社会部部长、黄龙分区公安处处长,策动了朝邑(今属大荔)、平民(今属大荔)、楼观台起义,争取了陕西警察局高级督察、太原绥署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及胡宗南的报务员、译电员多人弃暗投明。西安解放前夕,领导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西安城防图和国民党军统、中统各谍报组织布置的潜伏特务名单及电台,为西安的解放扫清了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任西北建筑工程总管理处处长。1954年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侦察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工作团党委委员、侦讯室主任、西北分团团长。1957年至1967年,任中共西安市委委员、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12月逝世。

·解字

“上”



这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上”字。①是甲骨文的形体。下面一条弧线表示地面,在其上有一短横,这就表示在地面之上。②是金文的形体,把表示地面的弧线拉直,上面的一短横,也是表明在地面之上的意思。所以在“六书”中,“上”字是一个纯符号的“指事字”。③是小篆,把“上”字又美化了一下。④是楷书的写法。

“上”字因为与“尚”字同音,所以有时可作“尚”字的假借字,当“崇尚”或“尊重”讲,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上农除末,黔首(黑头,即指老百姓)是富。”这里的“上”字就当“崇尚”讲。这句话的大意是:崇尚农业而革除商业等,老百姓也就富裕起来了。

惠子俊



惠子俊(1911~1944),曾用名荣生,化名薛斯。陕西长安(出生地今属西安市新城区)人。1926年小学毕业后因家贫到一家店铺做工,不久入陕西机器局兵工厂做工。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北伐战争,惠应招随军东进,同年秋因部队在河南作战失利,到河南巩县兵工厂做工。1930年11月惠随杨虎城部队回西安,仍在兵工厂做工。1933年春,惠到陕西耀县照金根据地参加红军,与桂生芳等创建薛家寨修械所,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10月照金根据地失守,惠等突围到陕甘交界的南梁一带,任庆阳游击队指导员(后游击队扩大为支队改任政委)。1934年初,惠子俊和张秀山、强家珍、马仰西等率领游击队在庆北地区扫除地方反动武装,成立庆北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同时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同年5月,惠调任红四十二师第二路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9月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11月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任书记。在惠领导下,陕甘边和陕北广大军民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解放了安定、靖边、赤安等6座县城,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

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红军和游击队也得到发展壮大。是年7月,惠被错误地扣上“右倾取消主义”帽子,被免去西北工委书记职务,任中共米西(今陕西米脂西部)县委书记,9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惠调任赤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6年底,惠化名薛斯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37年1月,中共西安市委重新建立,惠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3月25日,中共西安市委改为中共西安市工作委员会,惠任副书记,1938年春接替张德生任市工委书记。1938年11月,中共西安市工委又改为中共西安市委,惠仍任市委书记兼市委职工委书记。1939年4月,因叛徒出卖惠子俊被捕,后经中共组织营救于6月出狱,出狱后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因被捕问题接受组织审查长达两年。

1943年,惠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贸易公司副经理。1944年10月病逝。



韩信,江苏淮阴(今江苏清江西南)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汉三杰之一。幼时家贫,但志存高远,经萧何向刘邦举荐,登坛拜将,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以智谋助刘邦攻占了关中。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间相持时,他率军抄袭项羽后路,破赵取齐,因功被刘邦封为齐王。不久,他与刘邦会合,灭项羽于垓下,全歼楚军,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西汉开国元勋”。汉朝建立后,改封楚王。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因有人告其谋反,被降为淮阴侯。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9月13日,被汉高祖刘邦的夫人吕后和萧何诱至“长乐宫悬钟之室”杀害。后葬于灞河东岸(今灞桥区新筑街道办事处龙王庙

村西头)。

关于韩信墓,《咸宁县志》卷十四的“陵墓志”中记载:淮阴侯韩信墓在古长安城东三十里。《关中胜迹图志》记载:汉淮阴侯韩信墓在长安城东三十里新店(即新筑镇),墓前有庙。灞桥区新筑镇龙王庙村西,早年有一奇特古冢,五丈见方,形似馒头,上有四棵千年古柏高耸古冢之上,冢的南侧立一龟座石碑,上书“汉淮阴侯韩公信墓”八个大字,为 大清乾隆四十一年陕西巡抚毕沅立石题字。

韩信是怎样葬在这里?据《西安通览》记:当年韩信被杀后,他的许多部属深为不平,大家感念淮阴侯的丰功伟绩和平日的恩德,便偷偷地把韩信的首级运至长安城外,在灞河东岸火烧村之南妥善地进行了埋葬。当

关于韩信墓与火烧村的传说

◎ 吕忠让

地的百姓念韩信功高盖世、智勇无比,纷纷捐钱赠物,为之建立了陵园和献殿等,并在墓前竖一石碑,上面镌刻着“狡兔死良犬烹”几个大字,以此表达对吕后滥杀功臣的责慨和不满。这件事后来被官府知道,于是朝廷派兵前来,放火烧毁了献殿和陵园的其他建筑,大火殃及附近村庄,被烧的村子因而得名为火烧村。

在新筑镇民间中流传着一个关于韩信墓的十分悲壮、感人、生动的传说。

汉高祖刘邦晚年,吕后专权,她见韩信功高位尊,便与萧何商议除掉韩信。9月13这

天，天色阴沉，萧何用计将韩信骗入长乐宫内。韩信聪明过人，早已知道吕后对自己不怀好意。但他想到高祖曾对自己许下诺言“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信不杀”（天下兵器上均刻有“信”字，这样便不能用以处置韩信），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不料进了宫，只见“天上使着瞒天网，地上芦席铺几张，朝中无有斩信将，后宫院走来女陈仓”（秦腔“斩韩信”唱段）。原来这个宫女正是当年韩信走陈仓古道取关中时杀掉的那个樵夫的女儿，陈仓女手持一把菜刀，趁不防一刀结束了韩信的性命。韩信人头落地，冤魂不散，一腔热血喷倒陈仓女，随后，头颅化作一团烈火，在宫内寻找吕后不见，出宫朝东滚去，要到吕后行宫（即现在的吕家堡）找其理论。火球滚至灞河边，河水顿时断流，让出一条道路来，过河后，因不知路径，稍停留了一会，继续朝东，终于看见了一片村庄，便加大火势，一下烧了十三个村子。当时刮着东北风，滚滚浓烟笼罩了西南方一片村庄。正在继续东烧时，忽然一个白胡子老头前来，阻挡住了韩信头，告诉他吕后的行宫尚远未到，请将军且莫殃及无辜。韩信听劝后闭目熄火，老人便指地为穴，埋葬了韩信的頭，小小坟头一会儿变成一座巨大的陵墓。随后老头喷水浇灭了大火，事件平息。原来，这位老人乃是东海龙王。为感其灭火恩德，百姓在韩信冢旁修了龙王庙，旁边的村庄因此叫龙王庙村（即今新农村）。被烧误烧了的十三个村叫“火烧村”（即今贺韶村），韩信头过灞河停留的那个地方的村子叫停园头（即今杏园头），河水让道处的村庄叫水腰，吕后的行宫便是龙王庙村

东南方的吕家堡村。韩信被斩长乐宫，其头滚到窰寨村（今属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这块地方被鲜血染红，多少年来寸草不生，土呈红色，被后人称为“韩信滩”。

韩信墓碑楼和墓碑“文革”时期被毁，解放后村民长期取土，墓冢夷为平地，现只存有残牌照片。前几年，区政府在墓边立一石碑上刻“韩信墓遗址”。

2008年6月，有人撰联赞叹韩信：

千秋功罪韩侯冢；

一将姓名渭水声。

登坛拜将，兴汉灭秦，可叹功高惊帝王；

落雨吞声，刮风吹叶，似听灞水哭韩侯。

后记：①关于山西灵丘县“淮阴侯”墓，据专家考证认为：韩信尸体分身和首级分别葬秦晋两地。

②本传说涉及共七个村庄地名，即未央区的窰寨、水腰；灞桥区的杏园头、火烧村、雾庄、龙王庙、吕家堡。

③在临潼区斜口村现有韩信母墓（疑墓），当地流传着“韩信活葬母”的故事：韩信小时，在骊山九里山旁边放牛时，碰见一个看风水的老先生，先生对韩信说：“这个地方风水很好，谁若能将其母葬埋此地，日后定能成大业。”韩信听后回家将此事告知母亲，母亲随即答应愿让韩信将其埋葬此地，于是韩信挖了墓穴，将母亲置于墓穴内，埋了土，用一竹竿通上面，每天通过竹竿给母亲送饭，后来韩信终于成为著名的军事家。现在葬埋人给坟头插纸杆即兴于此。



“无为而治”： “去甚、去奢、去泰”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并崇尚的一个著名的治国安邦的方针政策。老子“无为”的本意是什么呢？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大概是因为“无为”这个词表面上太容易给人一种消极、无所作为的错觉，所以从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中国历史文化问题以来，它常常受到误解和批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被认为是“要人消极无为，什么也不做……与宗教唯心主义，所起的反动作用是一样的”。（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第116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更有甚者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其实是要恢复闭塞的、落后的奴隶制社会，使社会向后倒退”。（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

在学术研究中，随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套装”不足取，但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诠释古人提出的观点，也难免会离其本意相距甚远。

“无为而治”的内涵和实质——“去甚、去奢、去泰”。在老子的政治哲学中，“无为”，既不是中国某些哲学史专家认为的“什么也不做”，也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没有行动”。世界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无为”的真正含意应该是“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应该说，李约瑟的理解比较科学，基本逼近老子的本意。

其实，老子讲得很清楚：“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

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三十七章》)他又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是以不去。”(《老子·二章》)这就是说:道,常常是不去刻意做什么,但事情却因为顺应自然去做而无不成功。侯王若能遵守这个原则,万物就会自然成长。自然成长而至欲望萌发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教育它。道的真朴能使它不会起贪欲。天下人不起贪欲而趋于宁静,天下自然就安定。所以,圣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实行身教重于言教的方法。这样万物就会自然生长而不去争谁是创始第一,蕃生繁衍而不据为私有,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己能,大功告成而不自己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永存。

老子还明确地提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他认为,天下的禁令越多,人民就越贫困;人民的利器越多,国家就越昏乱;人民的思想越乱,邪恶的事情就越容易滋生;法令越多越森严,盗贼就会越多。所以,君王顺应自然,人民就自然化育;君王好静,人民就自然端正;君王廉政不搅扰民众,人民自然就富足;君王不贪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据此,德才优秀的领导者则要去除极端、奢侈的、过度的行为做法。《老子·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很明显,这就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本意和实质。老子认为,用这种看似没有什么作为的方法去治国安邦,恰恰能产生“无不为”的最积极的政治效果。

所以,司马迁评价道家学术时说,道家宣传无为,实际乃无不为,道家的文辞使人难于理解,但其主张是容易施行的,其方法是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领,能做到它,其思想和事业就可以不可磨灭。应该说,司马迁对老子“无为而治”的评价,符合老子的本意。

这种充分尊重民意,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政治智慧,反对朝令夕改和大搞形象工程,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具有不谋而合的历史契合点的重大意义。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汉初期,黄老的学术思想被广泛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以说这是黄老思想治国安邦的一次成功实践。“文景之治”盛世的历史印证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正确性:“我(指君王)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它表明,老子治国安邦的思想在汉代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很快就放弃了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当政者采取了高度的“有为”行动,并通过一系列战争来扩大帝国的版图,在一时强盛之势下酿成了国库空虚、社会秩序破坏等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至善巷里的特拘所

◎ 封五昌

至善巷是西安市小南门内东侧太阳庙门街中间路北的一条小巷。它南口东边有座庙叫“太阳庙”(现是太阳庙门街49号,西安贴花印刷厂址)。相传为明末清初建造。太阳庙门街因此得名。原有山门3间,两侧厦房各5间,前后大殿等建筑面积约900多平方米。民国以后,庙内仍有和尚居住,香火称盛。

1940年,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庙内成立了秘密监狱,1942年改名“国民党西北特种拘留所”,简称“特拘所”。这个监狱专门拘押共产党人以及进步人士,也拘押过少数国民党失职的特务情报人员。从1940年至解放前夕,共关押过5万余人,其中一些知名人士,如郑伯奇、武伯纶、郑竹逸、李鲠生、王释奇等都在这里关押过。狱内有各种格局的牢房,凡进入这里的人即与世隔绝,既不准通信,更不允许接见亲属。在严刑拷打、逼供之下,不少志士仁人蒙冤而死或壮烈牺牲。侥幸活着出来的人是极少数。

这所监狱平时门虽设而常关,从外面看不出什么异常。为了掩人耳目,在庙西首的至善巷内开了个小门,供他们出入。“特拘所”既是秘密监狱,内部工作人员均着便服。被拘押的人备受迫害不言而喻,就是附近居民也深受其扰。其门口设有监视来往行人的便衣,深夜有人过路就喝问:“干啥的?”要是说“回家”就没事,否则即遭到盘问,或拉至“庙”内审

讯。经常如此,令人不寒而栗!

大约在1944年的一个夏天,特拘所发生了一次重大越狱事件。据说,有个特工人员叫牛子龙的,因在洛阳失职,被送到这个监狱,称作“蹲大学”。这个牛子龙心毒手辣,是有名的神枪手。他深知这个“大学”好进难出,便盘算着怎么样越狱。牛在这里拘押时间较长,关的又是单间。他把平日做木工活的斧头磨快,等待机会。这天中午,天气特别闷热,所里人员正在午休,全院寂静无声,院内只有一个流动哨兵走动,东看看,西瞅瞅。牛子龙趁机把这哨兵叫到牢房跟前问话,哨兵刚把头伸进房子,就被牛一斧头砍在头上,一声不吭地倒在地上。牛子龙很快拿起哨兵的匣子枪,一口气跑到卫兵室,一梭子子弹击毙了全部警卫人员。随即掐断电话线,把会计从床上拉起来,令其开柜取款,钱一到手,立即把会计“拾掇”了。接着,他打开牢房门,大声喊道:“大家快逃命吧!”在混乱中,随即越墙而逃。

事件发生后约摸半小时,国民党当局发现这儿出了事。军、警、宪、特蜂拥而来,先是封锁了街巷两头,又在小南门的城上架起机枪。挨户进行搜查,让居民拿出身份证,无证的不由分说,一律带走。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才告结束。居民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

此后,特拘所墙内增修了岗楼,令人望而生畏。据说对重刑拘留的人戴上脚镣,在牢房

内不准走动，一有脚镣声，就有人巡视，还要遭到训斥或毒打，生怕重刑的人有逃走的可能。门前岗哨也较前增多。至善巷居民在黑夜根本不敢出门，亲友也断绝往来。太阳庙门街的居民，或过路的，为了避免麻烦，一般都沿着街的南边走动，视“庙”门为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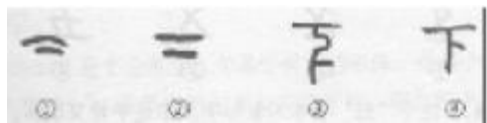
上述越狱事件发生以后，居民受害并没有停止。1947年下半年的一个下午，驻在五岳庙门街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军法处两个军官，不知因甚走进至善巷。特拘所守街口的便衣，掏出手枪，威逼他俩进所。其中一个军官见势不妙，撒腿便跑。不一会儿由街东头带来一排荷枪实弹的大兵，气势汹汹地把个特拘所的大门、偏门围得水泄不通。双方均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吓得附近居民纷纷紧闭大门，人人捏着一把汗，眼看着横祸临头。在一方要人，一方不放，两方相持不下时，又是军、警、宪、特呼啸而来，大车小车填街塞巷。特拘所门前吵吵嚷嚷，整整闹腾了三四个钟头，才相

继散去，最后以特拘所放人而结束。

随着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加重了对革命进步力量的迫害。特拘所的残暴手段、害人伎俩也更加骇人听闻。监狱内的一些牢房，被拘押的人全部躺在地上，几乎翻不成身，人满之患，可想而知。晚上只要听见门外有汽车声响，不是把拘押的人拉出去枪毙，就是把牢房的死尸运往荒野。据说从甘肃庆阳逮捕的毛泽润，在此关押了好几年；华县搞武装的地下党员吴利岑被叛徒出卖，也关于此；还有进步青年高子时、胡维选、吉宗义等，解放前夕均被活埋于耀县药王山。商县任道安，系国民党某部军官，经人告密，说他是抗大毕业生，也被害于此。解放后，人民政府在该所地道内和后院深井中，发现多具尸体。可以说，解放前这里真是“人间活地狱”！无怪当时西安广泛流传：“太阳庙门无太阳，至善巷变成至恶巷。”

·解字

下”



这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下”字，其形体与“上”字正好相反。①是甲骨文的形体，上面的一弧线代表地面，下面的一小短横是个指事符号，表明在地面之下。②是金文。③是小篆的写法。④是楷书的写法。

在古典文学中，“下”字含义很广。位低可称“下”，如柳宗元的《封建论》：“使贤者居上，不肖（不贤）者居下。”攻克亦可称“下”，比如唐著名诗人李白的《梁甫吟》：“东下齐城七十二。”这当中的“下”字就是“攻克”的意思。在古书中常见“下第”一词，一般的说“下第”就是“下等”或“劣等”的意思。可是《柳毅传》里“应举下第”中的“下第”是“落第”的意思，也就是说考进士没有考中。



古代的 房地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房地产进行有效监管的国家之一。“田有定主,民有定所”是历代王朝治国兴邦的首要政务,那么历代政府是如何来监管房地产的呢?

最早的“房产税”

从房产中征收一定的赋税,是历代王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为了规范都城内的商业集市及都城建设,就开始有目的地向商人征收一定的赋税。当时西周的商人分为行商与坐商,所谓行商就是在规定时间内进入都城贩卖商品的货郎担,而坐商指的是在都城内有固定店铺的商人,西周政府仅向坐商征收一种名为“廛布(钱)”的税。周代典籍《礼记·王制》中就有“廛,市物邸舍,税其舍而不税物”的记载,这是历史上最早有关“房产税”征收的条例。西汉承袭这一传统,向百姓征收名为“货算”的赋税,其稽核的标准也是以房屋及田产为统计对象的。

真正将房产作为独立征税对象应该肇始于唐代。唐建中时期,户部侍郎赵赞以军费不

济为名,建议向全国征收“间架税”,以缓解日益窘迫的财政支度。唐政府于公元783年颁布晓谕,在全国开征“间架税”。所谓“间架税”就是将百姓的房产按照占地面积、修筑年代以及房屋质量的好坏作为评判对象所征收的一种赋税。按当时的律例规定,“凡屋两架为一间,约价三等。上价间出税钱二千文,中价间出税钱一千文,下价出税钱五百文”。同时为了进行有效地监管,唐政府还规定但凡敢隐匿房产或谎报房产的屋主“匿一间,杖六十”,倘若有邻里告发,也可获得一定的奖赏。一时间“衣冠士族,或贫无他财,独守故业,坐多屋出算者,动数十万,人不胜苦”,何况是积贫积弱的平民百姓呢?由于政府征收高额税金,以致小民不堪负担,不少地方激起了民变。

北宋时期,国家处于常年征战状态,军饷筹措日蹙。为了解决巨额的军费开支,政府开始向民间征收“宅税”。由于北宋中央政府并没有制定统一的征收标准与定则,以致各地

征收情况迥异有别,差异甚大。经济较为发达的汴州、扬州与苏州等通都大邑,征收的税额高达数十贯不等,而一些穷陬僻壤之地,则少征或不征。

元代承袭宋代的做法,继续开征“宅税”,并且对房屋地基大小、新旧程度等制定了统一的征收章程。明清两代虽没有将房产税作为定税征收,但是每逢国库空虚、财力不支之时,也会临时开征“间架税”或“屋税”,直到乾隆时期,这种做法才完全废止。

近代以来,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始,西方列强开始窃据东南沿海城市的土地设立租界。当时上海的工部局借口巡捕房经费紧张,先后在租界内征收房捐。由于租界当局采取的是华洋有别的政策,尤其对华商经营性商铺征收较为高额的赋税,因此华商不得不诡寄名产,将自己的房产寄押在洋人的名下以寻求庇护。

古代的房地产评估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这是历史发展的不变准则。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并不能阻止民间田宅的买卖与交易。在古代,田宅的买卖一直以来都较为频繁,因而客观上也就孕育了“房地产估价”这个行当。从汉代的文献及现今出土的砖契、石碑看,就有专门对土地与房产进行估价的记载。譬如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簿书碑上就刻有“何广田八亩质(值)五千”、“王汶田顷九十亩贾(价)卅一万”的碑文,考古学家推定这应当是对田产估价后的凭证。

据学者考证,南北朝时期就孕育了房地产评估这个行业。在南朝梁代时,梁高祖萧衍

为了在南京的钟山建造大爱敬寺,欲强行购买王骞的80余顷良田。王骞本是南朝的士族,况且这些田地都是祖上东晋丞相王导的赐田,因而表示坚决不卖。梁高祖十分愤懑,“遂付市评田价,以直逼还之”,还通过聘请“房产评估师”,按市场价评估,然后威逼赎买。《文苑英华》一书中也曾记载陈代有个名叫徐枢的地主,因为亟需用钱,便要变卖房产,遂聘请业内人士进行市场估价,并张贴榜文在城内出售,后以4万贯的价格成交。唐代则明令禁止一般性的田产交易,尤其对私下及黑市交易有着更为严苛的管束。然而对于寺庙的房产与田地的买卖则不在监管的范围内。从现今遗存的唐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寺庙田产的交易记录。

宋代将“计产定资”作为赋税征收比率的依据。不少地方官衙就是通过评估百姓家中尤其是屋产的多寡来核定财产税的征收额度。

在古代,除了官差、胥吏充当“房产估价师”的角色外,民间还有一些专门从事房产估价行业的人士,如当时就有一种专门从事评估庄宅的牙人,谓之“房牙”。房牙的职责就是根据目前市场的房价走势及房屋成色制定售价并向买家兜售,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商。

元代遗存的地契中就载有泉州路一户人家欲将祖上留存的一处宅邸出售,“此宅居于城内,有花园一段、山一段、亭一所、房屋一间及花果等草木在内”。当时泉州府内的房牙蔡八郎招引城东隅的阿老丁前来就买,经官牙议定时价折合中统宝钞60锭,双方还立下契约为证。但是房牙有时也会媚富欺贫做出不

·史料钩沉·

公正的估价,《宋会要辑稿》中就载有小民承租官田之时,“田宅牙人虚添亩角,增抬钱数”。为此,历朝律例中对牙商欺罔邻里之事,都详细规定了惩处的条规与量刑的依据。

古代的房产租赁

唐代的房屋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当时都城长安的市、坊之间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其中商人较为集中的“坊”就有租赁活动的存在。譬如较有名的“布政坊”、“永平坊”、“兴道坊”等就有专人出租房宅给外地商人及胡商居住,以便在长安从事贸易。除了提供给商人房宅外,长安城内还有不少出租给应考举人、外省驻京管理人员及各地流寓人员的房宅,他们大多集中在东、西两市,因为这里是长安城中商贸活动最为繁华的地区,因此也聚居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李昉所著的《太平广记》一书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余干县尉王立调

选长安时,就曾佣居“大宁里”;而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调选时,就曾住于长安城的常乐里。

宋代的房屋租赁业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由于北宋在城市规划上打破了市、坊界限,因而出现了集商用与民用为一体的宅邸。随着宋代政策的宽松,不论何处,均可开设门面,不论何时,均可经营商业,这也使得一些大城市散居的人口日益增多,促进了城市租赁行业的繁荣。在当时的都城开封,沿汴河、蔡河两岸的官私房产就被房牙等中介商套购下来用于房屋的租赁,从而满足社会上各种承租者的需求。由于宅邸所处地段的不同,商家所出租店面的价格也相差悬殊,且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有所迥异。

清代以后,房屋的租赁市场日益规范,政府还专门颁发“契书”给商民以示“租赁”凭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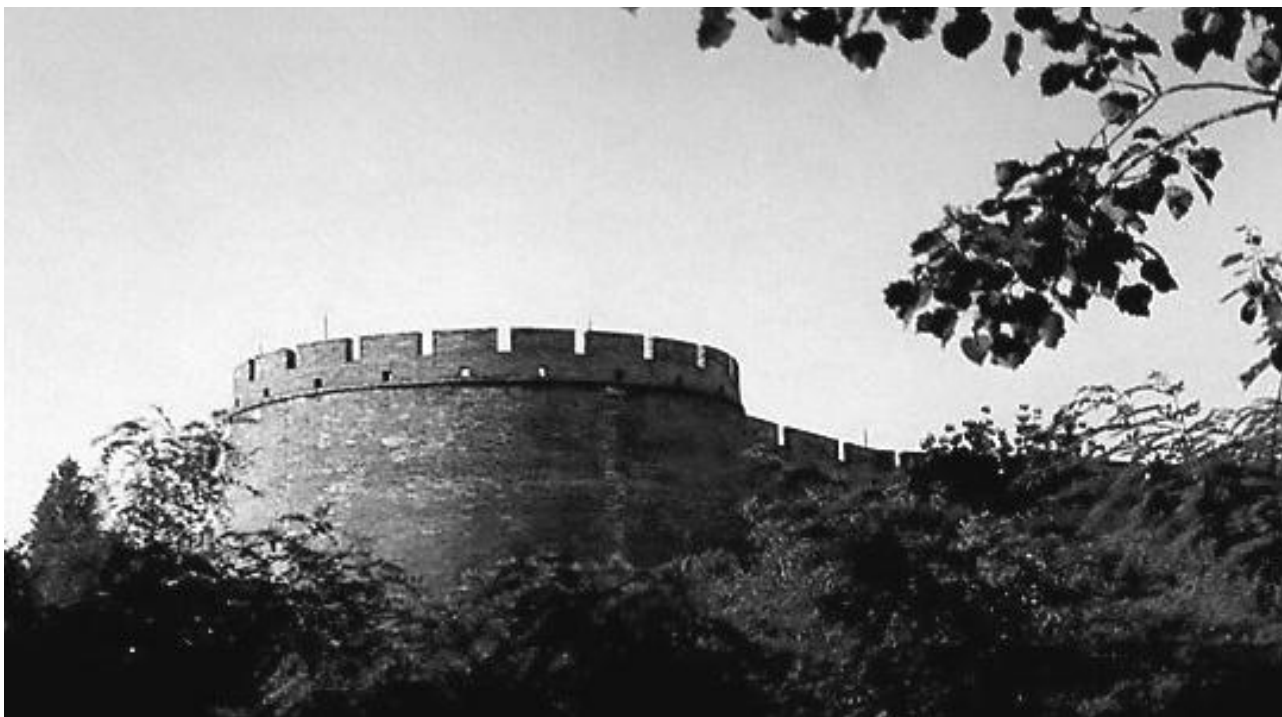
·文史拾趣·

金榜题名与“吃梦”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中记载,参加会试的士子们,在发榜之前,每有聚餐,与会者都不用带钱包,胡吃海喝完毕,由中了举人、进士的与宴者负责买单。因为在吃的过程中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吃”谁的请,而大家又都“梦”想这桌能由自己买单,所以,这就叫“吃梦”。由于当时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不够完善,不免有上了榜却逃单的人,于是,大家在与宴者中挑出一或几个不参加本科考试的人,让他们作“酒

监”。此即所谓“梦神”。一般情况下,“梦神”不用买单,故“咸乐为之”。只是,倘若手气不好,坐到一桌名落孙山的席上,则出钱人人有份,“虽梦神不得免焉”。“吃梦”的时间就在发榜的当天。因填榜都在夜里,故“吃梦”者从晚饭开始,可以一直吃到消夜时分,等到榜单传来,即行当场“买单”。





西安古城墙之城墙典故（三）

西南圆形城角之谜

今西安城的四个城角中，唯独西南城角为圆形，而其他三个城角为方形。对此，学者解释不同，民间也留传了有关故事，这已成为西安城建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一说隋唐长安皇城原有的城角都是圆形的，只是明初以皇城为基础向东向北拓筑城墙时拆除了其他城角，仅只保留了西南这一圆形城角；

一说隋唐长安皇城其他城角为方形，仅此西南城角形制建为圆形。这与古人对天体认识观念有关。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转地不转。天转有枢轴，这个枢轴就在天帝中宫左近，即位处西南的天枢星。因以唐皇城西南角象征天枢星所在，天以此为枢轴而转动，故唯独西南城角为圆形（1981年《陕西省文博考古

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逸人《汉唐长安城建筑设计思想初探》）；

一说此西南圆形城角“系唐末韩建新城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据称在1983年整修西安城墙过程的发掘考证，此西南城角系唐末韩建新城角台遗址，“原址是圆形，明初修建时，西南城角没有重修，就按原样加砖添土，所以西安城墙西南台是圆形的”（张景泐·景慧川《西安城墙史话》第39页）；

还有说是元代至正（1341~1368年）中重修奉元城时，将四个城角如同元安西王宫城四城角均为圆形一样，都按蒙古人蒙古包形改成圆形外突的形制，只是其他三个城角在明初扩建城墙时都拆除了。

张景泐和景慧川的《西安城墙史话》中还记载了一则关于西南城角为圆形的民间故事

传说,说西安的父老有把圆形城角叫忤逆角,是一个耻辱的标记。传说明朝时,在城西南坊住着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的男主人叫王林,早已病死,剩下年轻的媳妇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叫王富。

王富的母亲一直守寡,为人家缝缝补补,抚养儿子。过了20年,王富长大成人,母亲用一生的积蓄给王富娶了一房媳妇。媳妇长得花容月貌,可心底不善。办过喜事后,王氏因多年辛苦积劳成疾,瘫痪在床。新媳妇见状又哭又闹,逼着王富和他妈分家。王富忘恩负义,娶了媳妇忘了娘,竟然断了王氏的烟火,结果他妈活活饿死在床上。

这件事引起了街坊邻里的愤怒,便向官府状告他们夫妇忤逆罪。官府遂将王富夫妻斩首于王氏坟前。城西南角也因坊里出了逆子而不能砌成代表端方的直角,只能砌成圆角,以示耻辱,并在圆角上建一座三层八角圆形角楼,告诫后人,不要再犯忤逆罪。

《史话》说,这个传说宣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其实这和西南城角采取圆形的城防建制,并没有什么关系。

南城头上的魁星楼

在西安城南门东侧的城头上,建有一座高达16米左右二层四角攒顶式的魁星楼。此楼的修建,在西安城中有一段传为佳话的趣闻。

南城头上的魁星楼,祭祀的是神话中主宰文运之神“魁星”。魁星神像头部像鬼,一脚向后翘起,如“魁”字中的大弯钩;一手捧斗,如“魁”字中间的“斗”字;一手执笔,意谓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因此,从宋代以来学府中

皆置魁星楼,如明西安府学仪门内、长安县学之西均建有魁星楼,以祈魁星庇佑,文运大兴,学子科举中试。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在科举考试陕西乡试中,咸宁县学生员竟无一人中榜,使地方官员颜面无光。时陕西省行政长官左布政使高第作为“培风脉”,于是在咸宁县学二门外建砖塔,供祭魁星像;又在县学前南城墙“城头巽位(东南方)”修筑魁星楼,此楼西距南门城楼667.5米,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九月动工,次年六月建成。楼为二层四角攒尖式,高五丈一尺(约合16.32米)。尖顶薨宇,重檐雕栏,华贵壮观。自这座南城头上的魁星楼建成后,不知是否因咸宁县学有魁星高照,在历次乡试中再没有发生过脱榜之事。

明代在南城头上所建的魁星楼,毁于民国初年。1986年8月6日至1987年9月28日西安市环城建设委员会在原址上复建。复建的魁星楼为木结构楼阁建筑。楼下有正方形台基,边长9.4米,高6.55米。楼身二层,一层面阔5.3米,高6.1米,周回廊柱,廊深1.5米。东、西两面设拱形门两洞,四面无窗,内祀魁星像。室内靠东北处设楼梯一座,可登二层。二层屋面亦阔5.3米,高5.5米,周设回廊,廊深1.2米,四面为方格窗。层顶为四坡攒尖形式,上覆琉璃瓦,二重檐,檐下均施斗拱。斗拱为一斗二升。檐下均饰花卉彩绘。楼通高14.65米。

这座重建的四角攒顶、重檐雕栏、华贵壮观的魁星楼,如今已成为西安城墙上别有趣味的一处景观建筑。

雁塔区古城堡遗址

雁塔区古城堡遗址，有杜伯国和杜陵县城两处。

【杜伯国遗址】 杜伯国遗址位于今雁塔区山门口街道辖区杜城村周围。周成王八年(约前 11 世纪)灭唐(古国名,在今山西翼城县西北)迁其民于杜,立杜伯国。周宣王时封伯爵杜恒为首领。《括地志辑校》卷一载:“杜伯国在今县沿东南九里,下杜故城是。”《长安县志》卷十一载:“杜伯国其城周三里一百七十三步,即今县南十五里杜城。”

杜伯国建置随着历史变化有所嬗变,《路史·各国纪》载:周平王迁都洛邑,因秦哀公护送东迁有功,将岐地部分赐秦,在秦人尚无力管理泮水流域时,杜伯后裔趁机建起荡杜王国,国号亳。亳在杜(杜城)南,领南至终南山,北至渭河中游两岸地域。周桓王七年即秦宪公三年(前 713 年)因亳阻挡秦人东进道路,灭亳国,亳王逃西戎。秦武公十一年(前 687 年)在原杜伯国置杜县,是秦时最早县之一。辖区为今雁塔区全部、长安县大部和柞水县西北部、宁陕县东北部。

1985 年 3 月 4 日,在西安市、雁塔区有关部门和山门口乡人民政府主持下,各界代表及村民 1000 人在杜城村集会,纪念杜城建城 3000 周年。

【杜陵县城遗址】 杜陵县城遗址位于今

雁塔辖区曲江乡林带路西段两侧,西安市火化场南即三兆村与繆家寨之间。《长安县志》卷六载:“汉宣帝元康元年(前 65 年)以杜东原为初陵,更杜县为杜陵县,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于杜陵。”加上庶民百姓,《汉旧仪》载有 3~5 万户。

1976 年夏,曲江人民公社平整土地时,在西安市火化场附近发现杜陵县故城遗址。按照建筑分布测定,故城范围:东西长约 2000 米,南北宽约 500 米。城内西部有一条东西走向街道,长 300 米,宽 5 米,西城门遗址清晰可辨,街南有一排水沟,宽、深各 1 米,沟内灰土中杂有陶制碗、罐碎片及铁刀、铁铲、蚌壳、蜗壳等生活遗物。街道两旁屋基呈方形或圆形,夯土层厚 0.3 米,上有片石平砌,房基总面积为 1.5 万平方米。从屋基上挖出的用具有博山炉、铜锅、铜笼、铜酒器、陶碗、陶罐共 200 多件,汉代钱币(有货布、刀、方孔圆钱)1 万余枚,铸钱用的铁制坩锅(上口直径 10 厘米,下底直径 8 厘米,高 10 厘米)和磁铁矿石。城外有泥陶烧成的小贮粮仓 6 个,圆形,高 0.3 米,直径 1 米,壁厚 0.03 米,外壁有用细绳勒出的斜行纹道图案。从遗址挖出的部分街道、屋基和生活用品证明故杜陵县城在汉时是非常繁荣的。



西安市长安区兴隆乡北张村的楮皮纸制作技艺起始于汉代，至今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

北张村造纸所用的主要原料为构树皮(构树亦名楮树)。北张村制作的这种历史名纸叫麻纸,分为

黑白两种。采用冬季的构树皮造出的纸为白色,而用春夏季的构树皮(称为芽皮)造出的纸则是黑色。造纸的主要程序是:先将采集回来的构树皮进行筛选,之后放到清水中浸泡。然后把浸泡过的树皮放到石灰水中泡 2-3 天,再从石灰水中捞出放在大锅里蒸一天一夜,使树皮纤维彻底软化,再拿到河里将石灰和其他杂质彻底洗干净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糁,把糁用铡刀切碎后在一个大木杵的踏翻下将糁压成松散状,之后放到石缸里用石锤捣,使植物纤维变得更软更细,最后放到石槽

里淘浆变成均匀的纸浆。纸浆生成后便进入抄纸工序,在一块长方形木架子上摆好竹帘,用两根小木棍将小竹帘卡住,这便是抄纸的主要工具——模型。纸匠双手握住木架两端,先将竹帘的一端稍微倾斜插入纸浆槽中,挑起来后,再将另一端完全缓缓地沉入,大约 5、6 秒钟后迅速将竹帘捞上来,把竹帘反扣并轻轻掀起,一张白

皙的原始纸就造好了,这样一层接一层将纸叠压在一起。抄出来的大迭湿纸,要用木板和大石块持续压十个小时以上,以挤干水分。最后一道工序便是晒纸,把湿纸一张张揭起贴到墙壁上晒,这一工序非常关键,

不仅要细心,而且很讲究技巧,既不能把纸揭破,也不许使纸卷边。待纸张完全晒干后,把纸裁剪为成品,最后打捆出售。造纸的工具看似非常简单,但造纸的过程却非常复杂,大致要经过 10 道大工序,72 道小工序,而且全靠人力完成,劳动强度大,每天大约能造出三十四刀纸(100 张/刀)。

2007 年 5 月,北张村楮皮纸制作技艺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 6 月,被确定为西安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长安区北张村 楮皮纸制作技艺

(富小云 整理)



钱氏家训的力量

钱氏家族人才辈出，是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除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者钱缪，宋代以来，出了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如：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明末清初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文字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近现代植物学家钱崇澍，以及为共和国做出卓越贡献的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其琛，还有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裔科学家钱永健。早先，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钱氏家训》共635字，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个人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

圣贤。

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中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

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

花繁柳密处拔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

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家庭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六间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

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古同烹)，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社会

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

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

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

起谋,不见才而生嫉。

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国家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取役,宽以恤民。

官肯著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

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

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包青天 为何鲜有朋友



史书里记包拯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什么朋友,与亲戚也不往来(如果鞭打有违法行为的表舅不算“往来”的话)。他流传下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一篇家训,其余全是奏议。

包公的人格很了不起,是刚严峭直的典范,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饬得一无破绽,里里外外立于不败之地。

但从常识可知,人是不可能这样完美的。北宋时唐风未灭,人们还算开朗,不大遮头护尾,所以那些文人兼官员,虽栖宿不同,心事大略可知。但包公是个大大的例外。欧阳修疏论包拯之接受三司使的任命,说道:“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他是说人心隔肚皮,评价一个人,可信赖的还是他的作为。不过,如果得不到情感的线索,一个人的作为,或为迷雾所隐,或为光芒所掩,也会含糊起来。

包公的心事不为人知,是否应归罪于文献失传呢?宋人话痨最多,记述成风,可惜在如海的文集中,有关包拯的记录少之又少。王安石和包拯一同受过欧阳修的荐举,还曾是上下级,多少总有过从,但整部《临川集》,竟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那里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吴奎,和包拯亲密,给他撰过墓志铭;另一位张田,自称门下,给奏议结集。若无这两人,包公的形象,便只剩元杂剧中的了。当时多数人的心理或许是这样:对包拯,说他不好,实在说不出;说他好,又不情愿。人至察则无徒,此之谓也。



管仲最先提出了 “以人为本”

为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

管仲虽然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的治国之道,其实,历史上的政治家提出的“以人为本”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一,在古代,民本思想被视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是一种“驭民”、“治民”之术。第二,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在重民、亲民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君王驱使的“牛羊”,与民主精神完全相背。

在我国古代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在西汉刘向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霸王之业的言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

· 知识窗 ·

离别之歌为何称“骊歌”

“骊歌”在古汉语中已有使用,是“《骊驹》之歌”的省称。“骊驹”本是《诗经》中一首逸失的诗歌的篇名,该诗是古代告别时所赋的歌词,“客欲去歌之”。《汉书·儒林传·王式》记载说:王式应朝廷征召,被任命为博士(传授经书的职

官),声望很高。博士江公妒忌王式,排挤他。在一次宴请王式的聚会上,江公故意对负责歌唱的诸生们说:“唱《骊驹》吧。”意在敦促王式离开。后因以为典,以“骊歌”借指告别。



武则天并未造“曌”字

武则天名“曌”(zhào),现今许多人都认为“曌”字是武则天自己造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同‘照’。唐武则天为自己名字造的字。”《辞源》:“唐武后所造字,自取为名,以代照字。”还有书籍称:武则天由皇后变成女皇以后,认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没有谁能相比,自己所建的功业盖世无双,她想给自己取一个能准确体现出自己能力和功业的名字,但查阅了所有的汉字,认为都不配,于是造了一个“曌”字。此字读为“照”。含义是“日月当空,光照大地”。这种说法,一传再传,许多人信以为真。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载曰:“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这是武则天“武曌”之名由来的最早

史料。从中我们只能看出,武则天取“曌”字为名,但看不出此字是她造的。《资治通鉴》卷 204 载曰:“太后享万象神宫,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风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诏曰制。”这十二个字究竟是些什么字呢?胡三省在注中一一列出。其中就有“曌”字。这个记载清楚地表明,武则天是看了宗秦客所献的十二个字,认为“曌”字甚合其意而取为自己名字的。可见武则天并未造“曌”字。



古代尊师的皇帝

老师是伦理道德、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传授者，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的一些皇帝，深谙此理，因而对老师特别尊敬。

东汉明帝刘庄做太子时，桓荣是他的老师，他做了皇帝后，“犹尊桓荣以师礼”。《后汉书·桓荣传》载：桓荣生病，明帝亲自登门看望，并且一进街口便下车步行前往，以示尊敬。皇帝对桓荣如此，所以“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桓荣去世时，明帝还换了衣服，亲自临丧送葬。

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高祖石勒，以张宾为师。当时“张宾任遇优显，群臣莫及……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资治通鉴》）。张宾去世下葬时，石勒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泪，对左右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后石勒以程遐为右长史，每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就会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晋书·张宾载记》）

《贞观政要》录有唐太宗的《定太子见三师礼诏》，规定太子必须出殿门迎接三师（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称东宫三师），“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太子李承乾的老师李纲因脚疾不便行

走，太宗知道后特许李纲坐轿进宫讲学，并诏令太子亲自迎接。魏王李泰对老师王珪不尊敬，唐太宗生气地训诫他：“以后你每次见到老师，就如同见到我一样，应当尊敬，不得有半点放松。”

辛文悦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启蒙老师。《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戊戌，以辛文悦知房州事。帝初从文悦肄业，及即位，召见，授太子中允，判太府寺。”

明武宗朱厚照绝对是个荒淫无耻的混账皇帝，但他对自己的老师靳贵却很尊重。靳贵病逝时，武宗恰好南巡至镇江，就亲至他家致奠。武宗命随臣写祭文，写了几篇，都不如意，便亲自动笔。文曰：“朕在东宫，先生为傅；朕登大宝，先生为辅；朕今渡江，闻先生讣。哀哉！尚飨。”言简意赅，却真挚感人。

清朝康熙皇帝时，彭始抟为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老师。一次，彭始抟因胤禛不会背书而罚他下跪。皇后得知，怒气冲冲地拉起胤禛就走，并说：“皇儿读书为君，不读书也为君。”彭始抟当即顶撞说：“读书为明君，不读书为昏君。”后来康熙知道事情的经过后，责命胤禛绘一幅《御筵课读图》——图上康熙与彭始抟相对而坐，旁侧跪着胤禛。这幅画因此又叫《跪师图》。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是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两句诗，其中的“血色罗裙”就是我们所说的“石榴裙”。

石榴裙的本意是朱红色的裙子，以其色彩艳红如石榴而得名，后成为美女的代称。历代诗文中写到“石榴裙”的不胜枚举。最早提到“石榴裙”的是南朝梁代何思澄的《南苑逢美人》：“风卷葡萄带，日照石榴裙。”诗中的“石榴裙”就指的是美人穿的大红裙。可见“石榴裙”一词早在 1500 多年前的梁代就已经出现在诗歌中了。武则天的《如意娘》一诗也写到了“石榴裙”：“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面对和情郎约会时穿的石榴裙，即使是强硬跋扈的武则天，也难掩饰情意绵绵、柔情似水

的一面。

直接以“石榴裙”代指美人的是苏轼，他的《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中有这样两句诗：“杜牧端来觅紫云，狂言惊倒石榴裙。”诗人以杜牧自比，抒发了疏狂不羁之情。

现在的“石榴裙”，一般见于“拜倒在石榴裙下”一语中，是说一些有姿色的女子凭借自身的优势，颐指气使，使男人拜倒在其裙裾之下。

“拜倒在石榴裙下”成为崇拜女性的俗语，传说与杨贵妃有关。杨贵妃很喜爱石榴花，平日也总穿着石榴裙，唐明皇就在华清池、西绣岭、王母祠等地广泛栽种石榴供贵妃观赏。每当石榴花竞放之际，唐明皇便与杨贵妃设酒宴饮，不理朝政。大臣们不敢指责皇

上，于是迁怒于杨贵妃，对她拒不施礼。杨

“拜倒在石榴裙下”从何而来

贵妃向唐明皇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唐明皇立即降旨，凡是见了贵妃拒不跪拜的，以欺君之罪严惩。众臣无奈，见到杨贵妃身着石榴裙走来，无不纷纷下跪施礼。后来，“石榴裙下”或“石榴裙底”一语便被用来指某一美女脚下。元曲作家张可久有一首《水仙子》，写的是作者游湖，傍晚在归来的路上偶遇佳人的风流韵事，曲中并把此事和杨贵妃的逸事联系起来。“桃花马上石榴裙，竹叶樽前玉树春，荔枝香里江梅韵。风流比太真，索新词缠住诗人。醉眼空银汉，歌声度锦云，凉月黄昏。”其中的“太真”指的就是杨贵妃。

蜗居何以成“贫穷”代名词

“蜗居”一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 1000 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记载,汉末隐士焦先露首赤足,结草为裳,“自作一瓜牛庐(瓜通蜗),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可见,至迟在《三国志》成书之晋朝,已有“蜗牛庐”一称,且据裴松之所注,蜗牛庐确系为“圆舍”。起先“蜗居”一词主要用来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已属显然。据大量材料显示,唐宋之际,蜗牛庐(或蜗庐)、蜗舍等称不绝于史,且对早先魏晋“蜗牛庐”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蜗”字具体语义已由原先“圆形”而向“窄小”发生转变,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如唐初骆宾王有诗言:“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贫居的文人诗词中,常可感受其“蜗庐”生活的苦寒。如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宋人黄庭坚亦有“孤材小蜗舍,乞火乾履袜”留于后世。当然,唐宋之际,“贫穷”者并未落魄到动辄遭人不耻的地步,故而宋代与“蜗居”相关的故事,时常也散发着“穷且守道”、“贫益志坚”的逸致豪情。明清之际,蜗舍、蜗庐、蜗居等词已完全脱离原初“圆舍”之意,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简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当时市井生活以及颇能折现时人心境的小说中,即常将“蜗”字与“窄”、“陋”、“小”等字连用。

明末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 2 中说及:“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此处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蜗居”,实际上是个“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的小康之户。

《聊斋志异》卷 4 中写一书生见到“笑弯秋月而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时,不无偏见地赞道:“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在这里,“蜗庐”几成“贫贱”的代名词。

明清之际,因“蜗居”一词的频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词性亦时有变化,如《兰花梦》第 22 回提及银屏准备到宝林的闺房“细看看”时,宝林便说道:“没有看头,蜗居得很!”此处“蜗居”二字已由原来的名词转变成形容词。

明清小说之中的蜗陋等词,有时固属剧中主角谦虚自抑之语,但作为剧外主角的作者频频使用这些词语,亦能间接折现出时人因居所窘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1930 年鲁迅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

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湮没不彰。蜗居何以成“贫穷”代名词

“蜗居”一词最早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但后来渐成“屋宇窄小”的代名词,这种变化发生在 1000 多年前的三国魏晋时期。

《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记载,汉末隐士焦先露首赤足,结草为裳,“自作一瓜牛庐(瓜通蜗),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可见,至迟在《三国志》成书之晋朝,已有“蜗牛庐”一称,且据裴松之所注,蜗牛庐确系为“圆舍”。起先“蜗居”一词主要用来比喻屋之形状而非大小,已属显然。据大量材料显示,唐宋之际,蜗牛庐(或蜗庐)、蜗舍等称不绝于史,且对早先魏晋“蜗牛庐”的故事多加提起,但“蜗”字具体语义已由原先“圆形”而向“窄小”发生转变,甚至成为“贫穷”的代名词。如唐初骆宾王有诗言:“鹑服长悲碎,蜗庐未卜安。富钩徒有想,贫铗为谁弹。”而白居易更是言及:“庭小同蜗舍,门闲称雀罗。火将灯共尽,风与雪相和。”

在宋代一些失意贫居的文人诗词中,常可感受其“蜗庐”生活的苦寒。如陆游曾多次以“蜗居”一词入其诗文。宋人黄庭坚亦有“孤材小蜗舍,乞火乾履袜”留于后世。当然,唐宋之际,“贫穷”者并未落魄到动辄遭人不耻的地步,故而宋代与“蜗居”相关的故事,时常也散发着“穷且守道”、“贫益志坚”的逸致豪情。明清之际,蜗舍、蜗庐、蜗居等词已完全脱离原初“圆舍”之意,而大多是借以描述所居房屋窄小简陋。有意思的是,明清大量反映当时市井生活以及颇能折现时人心境的小说中,即常将“蜗”字与“窄”、“陋”、“小”等字连用。

明末凌蒙初在《初刻拍案惊奇》卷 2 中说及:“窄小蜗居,虽非富贵王侯宅;清闲螺径,也异寻常百姓家。”此处既非“王侯宅”又非“百姓家”的“蜗居”,实际上是个“上比不足而下比有余”的小康之户。

《聊斋志异》卷 4 中写一书生见到“笑弯秋月而羞晕朝霞”的公孙九娘时,不无偏见地赞道:“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在这里,“蜗庐”几成“贫贱”的代名词。

明清之际,因“蜗居”一词的频繁使用,甚至致其原初的词性亦时有变化,如《兰花梦》第 22 回提及银屏准备到宝林的闺房“细看看”时,宝林便说道:“没有看头,蜗居得很!”此处“蜗居”二字已由原来的名词转变成形容词。

明清小说之中的蜗陋等词,有时固属剧中主角谦虚自抑之语,但作为剧外主角的作者频频使用这些词语,亦能间接折现出时人因居所窘迫而产生的局促之感。当然,明清文人时以“蜗居”自谦居所简陋,有时亦是表露自己的高风亮节。

民国之际,“蜗牛庐”一语仍时常见于词林语汇之中。1930 年鲁迅在一次学校演讲中批评当时政治环境不利于“象牙塔文艺”的发展时讽刺道:“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其后来的《二心集》序言中解释道:“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合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在鲁迅的眼里,魏晋时期“蜗牛庐”已完全变成当时“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之类的设施,最终使其原初“圆舍”之义完全湮没不彰。



清代八旗兵的特权

八旗兵是满洲赖以兴起和发展的根基。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随着建州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势力不断强大,努尔哈赤“以徠服者众”,正式创建旗制,即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以“既削平诸国”,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参用其色厢之”,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旗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称为八旗,亦称“八旗满洲”。八旗由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侄分领。八旗内壮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八旗兵实行薪给制,每人每月都有一定的“饷银”,每年有一定的岁米,数额多寡不等。

清廷入关前后,八旗兵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袞的领导下,不仅执行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而且有着严格的纪律,一

切按领袖们的“预画胜负谋略”行事,“克城攻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故“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一鼓而胜”。由此八旗兵成为建州女真统一东北女真各部和统一全国的主要武装力量,战功赫赫。万历四十七年与明朝的萨尔浒之战即为明证。

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四月,明廷以杨镐为辽东经略,率10余万明军(对外号称47万大军)四路征讨后金。而当时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军队只有6万人,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遣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率八旗兵主力截击明军主力杜松一军,两军在萨尔浒山进行了殊死战斗,“明兵出阵发枪炮,我兵仰射之,奋力冲击,不移时,破其营”,杜松全军覆没。随后,明其他三路军队也为后金军击败。努尔哈赤由此取得了历史上著



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萨尔浒战役的胜利。萨尔浒战役的胜利为后金——清占领全辽、进军中原打下良好的基础。

清统治者定都北京以后，为巩固政权，竭力使八旗旗人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八旗旗人的制度和措施，其中主要有：

第一，对八旗旗人在生活上给予多种优待。顺治元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徭、粮草、布匹，永停输纳。”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同时还发给口粮赡养其家属：“七岁以上即食全俸，六岁以下为半口，减半给粮。因是不劳而食，坐享厚利，如待哺之鸟。”此后，又将京畿 500 里内圈占的土地拨为旗产，强迫汉民交纳繁重的租税。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了赈济八旗的条例，从各方面对旗人给予优待。从顺治开始，清代历朝皇帝都以发放帑金和赏给八旗兵丁钱粮的方式优待旗人。仅康熙一朝，清廷就以“赈济”旗人为由先后发放帑金 1200 万两白银。

第二，赋予八旗旗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旗人犯法，普通的地方官吏不敢管，也没有权力管，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时，他们还享有“减等”、“换刑”等特权。再有，清统治者虽然也公开谴责旗人不该因其奴仆小有过失即“殴毙命”，但还是允许旗人随意处置自己的奴仆。

第三，扩大旗人升官途径。清廷定都北京后，王公贵族身居各种要职，享尽荣华富贵。一般旗人既可通过考试入仕，也有其他各种机会做官。如康熙十年，“奏准八旗满洲监生识满汉字者，考试翻译；只识满字，考试缮写。优者授为正八品，以部院笔帖式补用”。

然而，历史进程却与他们的愿望相违。由于八旗旗人获得了种种特权，其子弟受到了

严重腐蚀，由他们组成的八旗军队也很快腐败起来。他们在衣着上“竞尚鲜华，多用绸缎，以穿着不及他人耻”；又“往往耽于口腹，饷银一经入手，不为度日之计，辄先市酒肉，以供醉饱，不旋踵而费用业已告竭。又支领官米，随即贱价售与铺家，只顾目前得银使用，不肯稍为储蓄，而家中食米转零星用贵价向铺户余买”。有的当月钱粮不敷花销，遂将次月钱粮典当出去，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久而久之，八旗军队的素质日趋低劣，战斗力大为减弱。三藩叛乱时，吴三桂就说过：“清朝军中向者旧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事实也正是这样。康熙时期，“从龙入关”的老一辈皇族贵胄相继故去，他们的后代，由于多年养尊处优，大多数人已成为纨绔子弟，渐渐失去勇敢善战的精神和高超的骑射技艺。康熙平定三藩之初，尽管康熙帝全心全意依靠皇族出身的王爷、贝勒，令他们挂帅，统兵出征，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满族将帅的作为令他大失所望。他们没有“励忠贞之谊，早奏戡定之勋，以副朕爱民至意”。自用兵以来，大将军、王、贝勒、将军、大臣等，“亦有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委甲兵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者。甚而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据利藪。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须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而尤其令康熙不能容忍的是，一向为其所信任的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多罗贝勒察尼在率兵出征湖南时，竟然“不速扼要害，乃退缩不前，老师糜饷，坐失事机”，“敛取督抚司道等官财物，希图肥家，贻误国事，疲敝兵马，困苦民生”。将帅如此，广大八旗兵的战斗力更可想而知。康熙十六年，清安亲王岳

乐、征南将军穆占统领十九路“皆经简择”的“精兵”，在浏阳将吴三桂部将王绪“围之数重”，连观战的吴三桂都以为吴军“全没矣”；然而风云突变，“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撻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在这场战斗中，吴三桂侄吴应贵为流矢所中，翻身落马，被吴军救回城中。穆占追至城下，三桂伏兵“起而冲之，清兵披靡而走”。这一仗充分暴露了八旗军的腐败衰弱。如此腐败的八旗军虽不能打仗，但在骚扰百姓、抢劫财物、拐卖妇女儿童等方面却变本加厉，八旗兵丁“慄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而地方官“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军纪之败坏，军心之涣散，战斗力之削弱，必然使清朝海防武备空虚，并逐渐丧失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力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八旗军队的腐朽，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军事原因。

八旗兵的衰败与清朝吏治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官吏的贪污受贿，是封建社会中十分普遍的现象。清朝统一全国后，满洲贵族和封

建官僚、地主阶级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导致他们疯狂敛取钱财，贪污受贿盛行。顺治、康熙及其后诸帝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力图澄清吏治，抑制腐败，但收效甚微。官吏的贪污受贿必然影响着八旗将帅。八旗将帅在平定吴三桂叛乱中，就不断发生向地方督抚收取贿赂、聚敛财产和隐匿掠卖三藩妇女、儿童的事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旗兵衰败愈演愈烈的趋势。

清朝八旗兵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所采取的“崇尚满洲”的国策。清朝是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而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此后长达 30 余年的民族征服战争，使清统治者以为，只有进一步依靠满洲八旗军，才能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采取了前述一系列保持和维护八旗满洲优越地位的政策和措施，而这恰恰腐蚀了八旗兵，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平定三藩时期，康熙帝不得不任用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等绿营将领进军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的事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明。

· 知识窗 ·

“鸿沟”的来历



“鸿沟”一词源于秦末的楚汉战争，是两军对峙的临时分界线。据史书记载，公元前 204 年，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一带的古战场激战，项羽的兵力虽强，而刘邦凭借后方粮草充足的条件，使项羽无法可施，被迫提出“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双方暂时息战。鸿沟是古代的运河。现今在河南省荥阳城东北的广武山上尚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面的叫汉王城，东面的称霸王城；两城之间有一条约 300 米的大沟，即有名的“鸿沟”。



戈登的愤怒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由太平军主帅谭绍光把守的苏州，谭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郜云官，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李鸿章派他出面劝降，再合适不过。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程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本来各自履约就行了。可

是郜云官仍然心存疑虑，担心自己投降之后，李鸿章不兑现承诺。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诈降”与“杀降”屡见不鲜。想来想去，郜云官提出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戈登虽是英国人，但在这场战争中并非中立派，而是李鸿章的亲密战友。戈登刚到上海就接管了“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当时，在围攻苏州的大军中，就有戈登率领的“常胜军”。郜云官对此也清楚，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更相信英国人的信用。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

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毫无意外，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李鸿章略施小计，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又成功诛杀了八名“贼首”，自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但他忽视了当初谈判的证人——英国人戈登。戈登很快知道了真相，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

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

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在清政府看来,洋人的死脑筋简直不可理喻,但又得罪不起,只好想方设法打圆场。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

“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需要指出的是,戈登其实是个强盗。此人不仅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在圆明园冲天的火光中,就有戈登的身影。戈登之所以愤怒,不见得是为了主持什么正义,更非同情太平军将士,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想为自己正名。因为在他看来,言而无信的人走到哪儿都混不下去。

戈登与李鸿章的冲突,应该说是当时中西观念的冲突。西方人大多笃信契约精神,言出必行;而国人历来崇尚谋略,凡事都可灵活变通,兵不厌诈。曾国藩曾问李鸿章,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我只与他们打痞子腔。李鸿章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能抵抗列强,可惜屡战屡败,也许他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哪儿。

· 知识窗 ·



雨衣起源于周代

早在周代,人们已使用雨衣。最早的雨衣为草制品,名“蓑”,又称“蓑衣”。《诗经·小雅》:“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汉代的毛亨注释:“蓑,所以备雨;笠,所以御暑。”蓑草虽为贱物,轻易可得,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不分尊卑,外出遇雨,都穿这种蓑衣。随着时代的进步,比蓑衣进一步的雨衣,是用丝绢一类纺织品涂上油以后做成的,因称“油衣”、“油帔”。除蓑草、油绢外,古代雨衣还有用粗麻、棕丝等材料制成的。《北齐书·文苑

传》中有“首戴萌蒲,身衣蕴帔”之语,这里的蕴帔,就是指粗麻制成的雨衣。棕丝是棕榈树皮上的一种纤维,经过加工、整理,也可以编织成雨衣,俗谓“棕衣”。与此类似的材料,还有油葵叶,也非常适宜制作雨衣。不过这种雨衣仍以农夫、渔人所着为多,仕宦之家的雨衣,则多用油绢来制作,取其质轻。明代以后,雨衣的制作日益考究,所用材料也有多种。贵族男女的雨衣,则用一种柔软而不渗水的高级玉草编织而成,取名为“玉针蓑”。



铁丝网改变世界面貌

在带刺铁丝网发明以前，遍布美洲的大牧场几乎都没有“围篱”。牧场与牧场之间只是按照“先占”原则或以地理标志来划界。有一些农场主用大规模种植带刺灌木来替代围篱。但是树木生长所需时间很长，如有损坏不易修补。19世纪60年代末，俄亥俄州的史密斯发明了铁丝网。当时美国钢铁业正逐渐起步，铁丝价格已明显下降，所以铁丝网的制造成本远较种植灌木来得低廉，牢固程度却要好很多。

1874年，伊利诺伊的农场主约瑟夫·格利登改进了史密斯的发明，在铁丝网上绑上倒刺，发明很快就被富有商业头脑的盖茨看中。他开设工厂，专门生产这种新型放牧栅栏。到了1885年，美国牧场差不多都已修筑了铁丝网围篱。

随着铁丝网围篱的兴起，土地产权的纠纷迅速减少，相应的土地法逐渐为大家所接受，任何破坏和进入铁丝网围篱的行为都会

受到法律的严惩。短短一二十年里，人烟稀少的西部土地就被铁丝网划界而私有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带刺铁丝网的发明和普及，就意味着美国旧西部历史的终结。

1898年，争夺古巴的美西战争爆发。西奥多·罗斯福率领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作战，他在战争中就率先使用带刺铁丝网作为营地防卫。

1904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在旅顺要塞攻防战中大量使用铁丝网，并且首次在铁丝网上连接了高压电，再配以机枪、手榴弹等武器，使进攻要塞的日军多次受挫，日本军人战死5万，也没能顺利夺下旅顺。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刺铁丝网得到更为广泛应用。铁丝网与传统堑壕相结合，再架上机关枪，足以有效阻碍敌人步兵的突破。坦克和装甲车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发明，它们最初目的正是为了有效突破铁丝网的阻碍。铁丝网和坦克这组对手竞相升级，也在战

场上检验各自的作用。

同时,带刺铁丝网被广泛用于监狱和战俘营的周围,或者用于隔离带。久而久之,专制和限制自由的记忆就与铁丝网形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二战后,东德为了隔绝人民与西德的接触和投敌,从1961年8月开始修建柏林墙。柏林墙一开始就由铁丝网构成,后来才换成更为坚固的砖墙。

有经济学家称,铁丝网是“改变世界面貌的七项专利之一”。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教授因为提出“科斯定理”而获得诺贝尔奖。所谓“科斯定理”,是指在产权明晰的情形下,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或非效率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谈判而得到纠正。现实世界中,由于带刺铁丝网的出现,土地产权界定变得简单而明确,这样就间接地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但带刺铁丝网又是重要的战争工具,它象征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象征着恐怖的集中营,这个形象亦在人类心灵史上永久地留下创伤。

清朝选官以貌取人

清朝刚入关时,考取举人即可担任知县。到了乾隆时期,社会日渐稳定,官吏队伍健全,朝廷就提高了从政者的准入门槛,非进士不能为官。但进士毕竟凤毛麟角,赋闲家中的举人不断增多。为了不影响科举制度的稳定,清朝不得不考虑为落第举人另择出路,于是“大挑制度”应运而生。

朝廷规定,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参加“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大挑”规定,不考文章辞赋而根据相貌选拔录用,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

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在内阁举行,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每次叫进二十人,按序排列,先点三人,这是被选中做知县的。接着点八人,这是没选上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部出局。这些落选者之所以要被叫做“八仙”,那是因为站在一块儿,便如李铁拐、张果老般怪模怪样了。剩下九人不再点名,授以教职。二十人出去后,依次再进二十人,如此循环,直至结束。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脸型、身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等字形,中等为贯、日等字形,下等为身、甲等字形。同,就是同字脸,方而长;田,乃田字脸,方而短;贯,即头大且身体长而直;日,即肥瘦长短均适中,并较为挺直。符合以上四字标准的都可以中选。身,就是身体斜而不正;甲,是指头大身体小;气,是两肩不平,一肩高耸;由,即头小身体大。凡有以上长相的,则皆不入选。

尽管“大挑”要求举子容貌出众,有人却能因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有一个叫金孝廉的举人,五官布局极不合理,旁观者都不敢正视,因为看了都忍不住发笑。然而,此公一进挑场,负责主持的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一。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不解,那位王爷说:“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解释道:“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王爷的一时心血来潮,便决定了一个举子的前途命运。



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 文化部类志稿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0年6月29~30日,西安市志办召开西安市区县第二轮修志文化部类志稿研讨会。省地方志办副巡视员王新中、市县处副处长张世民应邀出席会议,市志办主任冯艳阳、副主任姚敏杰、纪检组长任昆明、各处负责人及各区县志办主任、主编、业务骨干4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代表紧紧围绕如何编纂好文化部类志稿的议题,踊跃发言,深入交流,广泛研讨,达成了基本共识。

《碑林区志》主编吉勇联系《碑林区志》编修实际,重点探讨了如何编写文化篇。他认为:一、文化篇应以教育、科技、文化(文物)三个篇目为主体构成,而其他尽管具有文化因素,如宗教文化、民情民俗文化、企业文化、社区

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但应该归属于相对合适的篇目中,而不应归入文化篇中。二、文化篇中是否含文物,应视本地域文物存量多少而定。三、文化篇要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四、二轮修志要做好补遗工作。首轮志书漏记、记述不充分的,本轮志书都要在不影响志书体例和结构的情况下,尽量做好补遗、补充和详记。

灞桥区志办编辑杜学文就其在文化部类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的实践跟大家探讨,他认为:一、要拓宽收集资料的渠道,可采取与业务相关部门沟通、走访知情人员、求助专家学者等三种方式,以充实资料。二、在搜集资料时,要明确目的,博采精收。三、在搜集资料

时,要注意寻根溯源,相互印证。四、在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取舍、归并组合过程中,凡具有灞桥地方和时代特色的内容,须浓墨重彩,以彰显特色。

未央区志办副主任刘超基就如何编纂文化部类志稿,提出以下几点:一、体例要与时俱进。要采用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著作为主体的体裁,紧密结合现实情况,与时俱进,拓展文化范畴。二、志稿要体现地方特色。不仅要写好本地域独有的文艺形式、文化活动、文物胜迹,也要写好共有事物中的佼佼者,更要通过图片求得直观地反映。三、内容要突出时代特色。首先要加强记载文化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其次,要着重反映业余文艺创作活跃情况;再次,要记录传统文化的复苏,最后还要重点记载对精神污染的抵制,如扫黄打非、清理和净化文化市场等。

雁塔区志办编辑朱家洲认为文化部类的内容应该汇集区域文化的成果,弘扬先进文化,凝聚民心乡情,满足群众文化需求,鼓励全民心向真善美,充分反映文化的时代风貌,体现地域的文化特质,促进文化力量转化成为建设家乡的强大动力。雁塔区志办搜集资料的主要渠道一是通过政府行为,借助街办之力落实资料搜集,二是通过网络下载非区属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公司企业、社会团体、医疗机构的资料,三是通过查阅报刊、图书和有关组织、个人提供的有价值的资料,采取剪贴、摘抄、复印的办法收集和采编散见资料。

临潼区志办副主任马文雅就二轮志书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记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

法,她认为:一、做好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入志工作非常必要。二、准确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充分凸显区县志地方特色。三、与时俱进,寻找妥善途径,以反映本区县地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彰显志书的时代特色。四、在记述上应该把握好四个方面,反映历史演进,突出地方特色,注重非物质性描述,并增强保密性。

《蓝田县志》主编卞寿堂认为文化部类的内容及安排,应依据本地域实际进行篇目的修订。《续修蓝田县志》文化部类包含文体、传媒、档案、史志、科技、艺文、拾遗等方面内容。为突出时代特色,增设了音响(网吧游戏)市场、健身娱乐活动、网络传媒,并且将档案、组织史、地方志归入文化范畴,使之回归本来属性。以拾遗的方式,专设一编《民间戏曲》,用以记述前志中未记录的蓝田民间戏剧曲艺的种类、班社、活动等。

省志办市县处副处长、《陕西地方志》主编张世民结合大家的发表即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文化部类应该包括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文物文献、档案、党史、地方志等方面的内容。二、要注重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抢救,更应该注意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和记载,也应注意民族集体遗产的研究和整理。三、从这次会议看,我们有一种研究学问、探讨业务的良好风气。西安市志办每年两度召开修志编纂研讨会的做法,为全省市县志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工作经验。

省地方志办副巡视员王新中对我市召开

●志鉴动态●

研讨会专题探讨文化部类的做法表示肯定并赞赏,他希望西安继续保持理论研究的优良作风和传统,进一步加强业务研讨和修志人员培训工作,营造浓厚的学习研究氛围,及时交流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编修名志佳作提供理论支持。关于文化部类志稿的编纂,他认为此部类内容广泛,事类甚多,要深入思考归属记述等问题。同时他强调指出,目前全国已出版的第二轮志书已近400部,与工作先进的省、市相比,我省差距不小,因此,各区县志办一定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加快修志进度。

市志办纪检组长任昆明最后强调:希望与会代表会后将自己的发言交流材料再做进一步理论的升华和修改完善,积极向《陕西地方志》、《西安地方志》刊物投寄。适当的时候,市志办拟组织一次全市区县第二轮修志的优秀论文评选,并将一些具有深度的理论文章编辑成册,向其他地方的修志同仁推出。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工作中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并善于梳理总结,在打造精品志书的过程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推出自己高水平、深层次的修志理论文章。

·名句欣赏

(1)【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史记·商君列传》引古语

恃:依靠

(2)【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汉·桓宽《盐铁论·非鞅》

扁鹊:战国时名医。 肉白骨:使枯骨上长出肉来。

微:微子,商纣王的庶兄,曾数谏纣王,王不听,遂出走。

箕:箕子,商纣王的诸父,曾数谏纣王,王不听,把他囚禁。

存亡国:使将亡之国得以生存下去。

(3)【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后汉书·申屠刚传》

专己:固执己见,独断独行。

(4)【天下之理,舍亲就疏,舍本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

《关尹子·九药》

暂:暂时。害生:有害于生存。

(5)【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强国》

好士:欢迎贤人。

“三寸之舌”缘何不烂

“三寸不烂之舌”是形容能言善辩之人的最常用的一句俗语。“三寸之舌”典故始见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自荐的故事。秦国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赴楚国求救，他的门客毛遂主动请求随行。到楚国后，毛遂摇唇鼓舌，终于说服楚王救赵，平原君遂有“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感叹。《春秋元命苞》解释说：“舌之为言，达也，阳立于三，故舌在口中者长三寸。”两汉典籍普遍使用“三寸舌”指称机辩之士，缘何后来增衍为“三寸不烂之舌”？这“不烂”一说应该渊源于佛教观念。

众所周知，佛教自创立以来，为张扬教义，广播影响，注重集结经典的同时，更为重视口头宣讲。从佛祖释迦牟尼“口生莲华”的故事，到著名的玄奘法师在印度以其雄辩之才，学术大会上“竟十八日，无敢问者”（《续高僧传》卷四），从而声誉之隆，千古一人的史实，妙善说法历来受到佛门弟子的极度推崇。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至魏晋时势力始隆，经论讲习之风盛行，在《高僧传》所举讲经、诵经中，以讲《法华经》人数最多。《法华经》乃大乘佛学集大成之作，是中国佛教第一宗——天台宗据以立说的主要典籍。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卷六《法师功德品》说：若受持法华经，“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功德，千二百意功德”。其中修得舌功德，看似平常，实则对佛教徒有更大的诱惑力。

有关典籍中记载了多则奉诵《法华经》者死后舌头不会腐烂的故事。如《太平广记》卷

一百零九：“齐武帝时，东山人掘土见一物，状如两唇，其中舌鲜红赤色。以事奏闻。帝问道俗，沙门法尚曰：此持法华者亡相不坏也。”唐代诗僧齐己在《赠持法华经僧》一诗中赞曰：“我闻念经功德缘，舌根可等金刚坚。他时劫火洞燃后，神光灿灿如红莲。”而鸠摩罗什本人临终亦发愿“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及焚尸已，“薪灭形碎，唯舌不灰”（《高僧传》卷二）。从修持《法华经》，可得舌功德，从而妙善说法，何以为证？“身坏口不坏”（白居易《游悟真寺诗》），在俗世看来费解甚至奇谲诡异的现象，佛界有它严密的逻辑。则“不烂之舌”一说本与中国传统观念无涉，反之，与南北朝时期佛教特别是《法华经》的开始流行有着密切关系，原是佛教用来譬喻那些善说法的得道高僧当确定无疑。

从专指善说法的佛教信徒到泛称能说会道之人，其中有语义联系，亦有流变之径。南北朝隋唐乃中国佛学鼎盛时期，佛教对中国俗文学的产生功不可没。变文、话本、戏曲、小说，都与佛教文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今所见“三寸不烂之舌”，元戏曲中有，明清小说中更多。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学者喜其颖异，于有意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语言也是一样。许多佛教用语、典故、禅偈流传民间，逐渐形成汉语言有机的组成部分。有的还能看出其所自来处，如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等；有些则在流变中渐失其原义，“三寸不烂之舌”即为后者。



1583年9月10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行到达中国广东肇庆,随后在肇庆建造了中国大陆上第一座耶稣教堂。

利玛窦在教堂的客厅墙壁上,展示出一幅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把地球分成西半球和东半球展现在平面上,中国被置放在最东面的边缘地带。这让当时前往参观的明代士大夫们无不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在他们头脑中视为当然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被打破了,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国”的观念也被打破了。好在“天高皇帝远”,此事并未引起任何政治麻烦,但这却开阔了一部分士大夫的眼界。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利玛窦

的指导下,工部官员李之藻开始重制中国版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的自大意识,利玛窦让李之藻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将子午线西移170度,使中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初刊行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

此图终于被呈到了万历皇帝面前。万历皇帝细看之后,甚是喜欢,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里。一度担心此图轻慢了中华帝国辽阔版图的利玛窦终于放下

心来。

中国版世界地图是如何产生的

直到今天,

我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仍然沿用了《坤輿万国全图》的基本格局,中国依旧被置放在世界中央的位置,而与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截然不同。



中国版世界地图是如何产生的

1583年9月10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行到达中国广东肇庆,随后在肇庆建造了中国大陆上第一座耶稣教堂。利玛窦在教堂的客厅墙壁上,展示出一幅西文标注的世界地图。这幅世界地图把地球分成西半球和东半球展现在平面上,中国被置放在最东面的边缘地带。这让当时前往参观的明代士大夫们无不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在他们头脑中视为当然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被打破了,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天朝中国”的观念也被打破了。好在“天高皇帝远”,此事并未引起任何政治麻烦,但这却开阔了一部分士大夫的眼界。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利玛窦的指导下,工部官员李之藻开始重制中国版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

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为了迎合当时中国人的自大意识,利玛窦让李之藻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将子午线西移170度,使中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初刊行的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

此图终于被呈到了万历皇帝面前。万历皇帝细看之后,甚是喜欢,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里。一度担心此图轻慢了中华帝国辽阔版图的利玛窦终于放下心来。

直到今天,我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仍然沿用了《坤輿万国全图》的基本格局,中国依旧被置放在世界中央的位置,而与其他国家的世界地图截然不同。

·知识窗·

“挂靴”与“挂冠”

“挂靴”即把靴子挂起来,指足球、滑冰、田径等运动员退役,也可说成“挂鞋”。

“挂冠”,即把官帽挂起来,比喻辞去官职。据《后汉书·逢萌传》记载:王莽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王宇。逢萌对友人说:君臣父子这些纲常人伦都断绝了,还不离开,祸害恐怕要找上头来。于是“解冠挂东都城门”,携带家属出走,寄居辽东。后来便称辞官为“挂冠”。

“挂靴”、“挂冠”中的“挂”,意思是“搁置、放置”。汉语中还有许多“挂”字族词语,如以球拍为比赛器具的球类运动员退役称“挂拍”,教师、教练结束教学生涯称“挂鞭”,军人退伍称“挂甲”,收割工作全部结束称“挂镰”,锄地工作全部结束称“挂锄”,等等。这些词中虽然都有“挂”字,但意义各不相同,不能随意替代。

古人如何防暑降温

我国人民很早就知道冬天储备冰，以备夏天之用了。《诗经》中说：“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二之日”、“三之日”即周历的二月和三月，“凌阴”是指山阴处的藏冰地窖。自周代起，历代王朝都设专门的官吏管理冰政。隆冬时节，人们将河中的冰凿成冰块，放入地窖封存起来。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紫禁城内设冰窖五，景山西门外冰窖六，德胜门外冰窖三，正阳门外冰窖二，分藏京河、通州龙王堂、

莲花池等处之冰。现如今北京的雪池胡同还有冰窖遗迹。窖门很小，仅供一人出入。门洞小，能减少室内外空气交换。门里是两扇很厚的木门，据说木门的隔温效果是最好的。在窖底观察，整个冰窖有二三十米长，有十来米宽，二层楼那么高。窖顶上用大块大块的城砖砌成拱形，窖底是由巨大的石条铺就而成的。

那么，到了炎热的夏季，冰是如何储存、使用的呢？据介绍，旧时官宦富贵人家就已有冰箱。这种冰箱多为木制。箱内贮冰块，也可冷冻食物。上盖有钱纹孔，用于散发凉气。

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鉴缶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冰箱”。取下上面的方盖俯视这套鉴缶，其形状如同一个回字。缶在中间、外壁和内壁之间有很大的空间，也正是这个空间，才使其具有冰镇的功能。酷暑季节，缶内盛入饮料，中空部位放置冰块，人们就可以享用冰凉可口的饮料了。

在很早我们的先人就知道采用瓷枕解暑。“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久夏天难暮，纱橱正午时。忘机堪昼寝，一枕最幽宜。”这样的诗句都说明了瓷枕是夏季纳凉的极佳寝具。

古人在夏天防蚊虫也用蚊帐，但是他们用起来可比现代人有情调。少女们在帐内悬挂茉莉、珠兰等香花；巧手的妇女用花枝编成麒麟、鲤鱼等吉祥物挂在纱帐里。古人还有配挂香囊的习俗，许多香囊中的药材都有驱蚊虫的功效，比如藿香、薄荷、菖蒲。





古人如何将 瓷器运往欧洲

19世纪,中国瓷器大量出口欧洲。这些轻薄如纸、吹弹可破的“易碎品”,是如何远渡重洋,安然到达目的地的呢?

中国商人先在精雕细刻的樟木箱里填满茶叶,易碎的瓷器就埋在茶叶里。他们再把大樟木箱和几个小樟木箱装在钉于船舱地板上

的大木箱里,四周用次等的茶叶塞满。由于内外两层茶叶填充得非常紧密,木箱做得又结实,即使在海上遇到风浪,商家也可以高枕无忧。

更绝的是,货船靠岸,中国商人把茶叶筛选分包,卖给茶商。小樟木箱被当成首饰盒,卖到各地古玩店,大些的便卖给欧洲人当茶几、橱柜,最后卖的才是瓷器。樟木箱和茶叶的利润,有时甚至比瓷器还高。



“割股疗亲”割的是哪里

在古代,如果父亲或者母亲生了重病,在求医问药不灵,或者根本没有怎么求医问药之际,孝子就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给父亲或母亲做来吃,此曰“割股疗亲”,古人认为是大孝的表现。《新五代史·杂传·何泽》:“五代之际,民苦于兵,往往因亲疾以割股。”说的就是此事。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句中也隐含古有“割股疗亲”之意。那么“割股疗亲”割的是哪里呢?

《说文解字》说:“股,髀也。”髀就是大腿。鲁迅《故乡》里写到“豆腐西施”杨二嫂站立的姿势时说:“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两手搭在髀间”,就是两手搭在大腿上,而不是屁股上。《三字经》:“头悬梁,锥刺股。”“锥刺股”指的是瞌睡来了用锥子在大腿上刺一下,而不是在屁股上刺。表“屁股”的词是“臀”,古代汉语中也用“尻”(kāo)。古今汉语中,“股”不当“屁股”讲。

“弹指”有多快



我们形容时光短暂时常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其实这里的“指”就是手指，“弹指”就是捻弹手指作声的意思。佛家常用“弹指”来比喻时光的短暂。“弹指”也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量词，出自于印度的梵语。《僧祇律》上解释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二十弹指名一罗预，二十罗预名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照这样计算，24小时是30须臾，那么1须臾就是48分钟；48分钟是20罗预，1罗预就是2.4分钟；2.4分钟是20弹指，1弹指就是7.2秒。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换算，

7.2秒是20瞬，一瞬间是0.36秒；20念为1瞬，一念就应该是0.018秒。一转念竟然是如此短暂的时间，佛家常说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就更让人感慨了。这样看来，一昼夜就有12万个“弹指”，时常所说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将几十年比喻为一弹指的时间，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

“八百里加急”有多急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字样，按规定要求每天300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800里。“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用来表示情况紧急程度。

按唐朝政府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

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每天500里。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2万多人，其中驿兵1万7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律规定，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导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看，一般强盗不会去劫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致官方的拼命剿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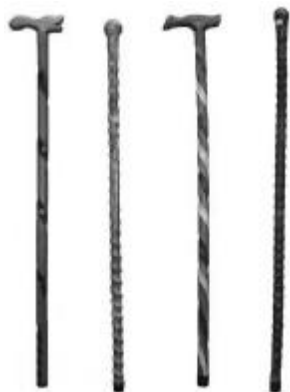
唐代的『疾足』

我国古代杰出的理财专家刘晏在管理唐王朝财政期间，设置了一套经济情报(信息)机构：各道院内，选派得力的“知院官”；各州县下，由政府任命专职官吏主持在交通要道设立驿站，并用优厚报酬招募了大批机智而精干的人为经济信息员，名曰“疾足”。这些“疾足”专门负责收集与传递各地有关农业丰歉、物资余缺、价格变化及百业行情涨落等经济情报。当他们了解到各方面

信息后，就策马疾驰，像接力赛跑一样，一站连一站地逐级传递，使中央不仅能及时掌握京城周围地区的市场行情，就是相距数千里的边远地方，只消几天工夫，也能得到当地准确的经济信息。刘晏对来自各地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即如实奏报朝廷，这对调节市场、扩大流通、促进当时的工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代有赐手杖给老人使用的定制。《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对于多大年龄、在什么范围可以用杖，《礼记·王制》做了规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意思是说：五十岁可以拄杖行于家，六十岁可以拄杖行于乡里，七十岁可以拄杖行于国都，八十岁可以拄杖出入朝廷，九十岁可以享受让天子就室问政的待遇。因此，古人以“杖家”、“杖乡”、“杖国”、“杖朝”分别作为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代称。

在不少古诗文中，用到了上述年龄的别称。如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九：“(刘钟宛



手杖与年龄

国初以秘书院学士抚山东，旋晋秩工部侍郎，告归八年，方值杖家之岁。”南朝梁任昉《答到建安饷杖》诗：“劳君尚齿意，矜此杖乡辰。”唐代上官仪《代刘幽州请致仕表》：“钟漏已殫，齿历云暮，杖国之年斯及，夜行之惧载深。”清代赵翼《初用拐杖》诗：“我年届杖朝，卅载林下叟。”





过华清宫

李贺

春月夜啼鸦，宫帘隔御花。
云生朱络暗，石断紫钱斜。
玉碗盛残露，银灯点旧纱。
蜀王无近信，泉上有芹芽。

鉴赏：

李贺这首《过华清宫》是一首严谨的五言律诗。它主要刻画的是华清宫今日之冷落萧瑟，且追述了华清宫清寂冷落的开端，其冷落之原因也不言而自见，前人曾云：“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议论者为最上。”前人又云：“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处。”这也就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李贺这首诗是得含蓄妙处的佳作。

诗的开头两句先从气氛上渲染：黯淡的月色，更增加夜的凄楚；在寂寞、凄凉的宫中居然传出似哭声般的乌鸦叫声，令人毛骨悚然。古人认为乌鸦是不祥物，经常用它来形容荒凉恐怖。李贺这里写曾经是那样繁华热闹的华清宫，在凄清的月色下传出了乌鸦的悲鸣，那凄凉之状就如见如闻了。

接下去中间两联，承接着第一联的气氛，用精雕细刻的笔法，绘出华清宫的荒凉、冷落、萧瑟。那荒凉的雾霭岚气，笼罩着宫殿，使朱红色的格子窗也显得那么黯淡无光；石阶折断了，爬满了紫青色的苍苔。这是宫室外边荒凉的情景。这一幅景象对宫室外边的满目

荒芜的情形作了精确的刻画。写到这里，诗人驰骋幻想，用两个出色的细节写宫殿里边的冷落：桌子上，精致的玉碗里，还盛着残剩的酒液；银灯上罩着的灯纱，污点斑斑，破旧不堪。宫殿里的冷落更带着一种狼狈的气氛，引起人们无穷的遐想。大概这是逃跑到四川去的皇帝跑之前还在寻欢作乐，酒宴上觥筹交错，灯烛辉煌；跑时来不及收拾一下，所以还留下这么一幅狼狈的情景吧！

这其中包含有深刻的讽刺，但含而不露，没有直接指斥他耽于逸乐，而是用两个细节来引动人的遐想。

清人方扶南认为本诗“结句佳”，这是很正确的，表面似乎是说：逃到蜀地去的皇帝还没有音讯时，温泉就长出野芹的叶芽了。这里实际上有两层深意：一是说明华清宫的凄凉不是今天始，而是由来已久，皇帝逃蜀之时已经开始凄凉；其二，更重要的是含蓄地点明造成华清宫这样凄凉冷落的，正是那逃亡蜀地的皇帝。

这首诗从多方面来刻画出华清宫凄凉的景象，它从气氛、宫殿外边、宫殿里边、凄凉的由来这不同侧面落笔，把华清宫的冷落萧瑟写得悲切感人，形成了具有悲剧美的意境。华清宫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唐王朝也失去了往日的鼎盛。这正是诗人主旨之所在。华清宫，在诗人笔下乃是唐王朝的缩影。